

F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5年3月号

聚焦拉古拉姆·拉詹

税收是如何运作的

经济学家们是过于乐观了吗?

金融与发展

就业情况 堪忧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金融与发展

为大家解读全球 经济超过50年



自1964年起，《金融与发展》杂志一直为读者提供有关国际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深入研究。

随着世界持续发生变化，《金融与发展》也将继续为您进行解读。

- 查看《金融与发展》往期内容，请浏览elibrary.imf.org/fd50
- 查看《金融与发展》最新的文章，请浏览www.imf.org/FandD



Jeremy Hayden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Gita Bhatt

Natalie Ramírez-Djumena

Jacqueline Deslauriers

James L. Rowe, Jr

Hyun-Sung Khang

Sim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Maureen Burke

Bruce Edwards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刷/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社交媒体经理

Niccole Braynen-Kimani

高级编辑助理

Meredith Denbow

编辑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Michelle Martin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Laura Kodres

Bas Bakker

Paola Mauro

Helge Berger

Gian Maria Miles-Ferretti

Paul Cashin

Inci Otker-Robe

Adrienne Cheasty

Laura Papi

Stijn Claessens

Uma Pamakrishnan

Luis Cubbedu

Abdelhak Senhadji

Alfredo Cuevas

Janet Stotsky

Domenico Fanizza

Alison Stuart

James Gordon

Natalia Tamirisa

Thomas Helbling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 2015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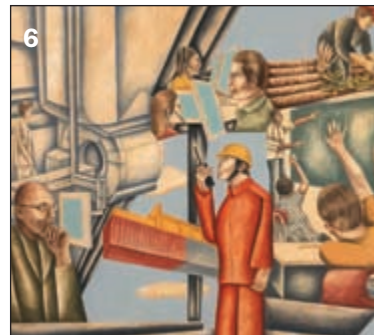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特 辑

就业情况堪忧

- 6 **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教育、移民和再分配是长期解决全球
失业问题的关键要素
普拉卡什·洛嘉尼
- 8 **七载低迷**
得益于各国政府有力的应对政策，全球
经济正从失业率高峰中缓慢复苏
普拉卡什·洛嘉尼
- 11 **规模问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企业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来兑现该地区的承诺
布鲁斯·爱德华兹
- 12 **任重而道远**
移民参与他国就业市场利大于弊
卡格拉·奥兹登
- 16 **就业与技术**
创新技术将工作者转移至新岗位，而非完全将其取代
詹姆斯·贝森
- 20 **萎缩中的中产阶级**
劳动力市场趋势对一些劳动者而言是天堂，但对大部分劳动者而言却仍是炼狱
埃克哈德·恩斯特
- 24 **图表释义：重返工作岗位**
全球失业率已经出现下降，但就业增长仍然疲软
里奥·阿布鲁泽斯
- 26 **欧洲失业问题**
要解决欧元区的失业问题，需要实现经济增长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安嘎纳·巴纳吉
- 29 **人民的力量**
最近几十年来工会组织的衰退促进了收入分配顶层人群收入的增长
弗劳伦斯·雅莫特、卡罗莱纳·奥索里奥·布依特隆
- 32 **观点：首要任务**
以工资和公共投资带动复苏的时刻已经来临
夏朗·巴洛
- 34 **年轻人的共鸣**
阿玛·波拉克克-休曼、艾哈迈德·哈山、佐藤拓实、
亚历克莎·克莱



本期还有

- 40 **预测效果：一片大好**
经济学家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往往过于乐观
胡琪昂、保罗·莫罗

深受打击，但并未退缩

本期封面的灵感来自收藏于底特律美术馆的由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 创作的壁画《底特律的工业》。墨西哥艺术家里维拉在 1932 年受托创作一个 27 幅的史诗性的画作，献给该市的流水线工作者、科学家、医生、秘书和劳动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时正在大萧条的严峻环境中挣扎着，力求保住自己的工作。

里维拉的壁画很复杂，充满争议和赞美。但有关壁画的形式——大画布、开放公众审查——却变得流行起来。在美国，诸如公共事业振兴署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这是政府“新政”的一部分，旨在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的政府机构支持艺术家，成百上千的壁画出现在邮局、政府大楼和其他公共场所。这些壁画中很多都是赞扬工作者的，他们受到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但并未退缩。

由美国艺术家理查德·唐斯 (Richard Downs) 创作的这期《金融与发展》的封面，目的是为了将焦点聚集在当今的工作者身上——自 2008 年大衰退以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在努力寻找工作——并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采用折页式的封面，这样封面可以反映由诸多因素造成了 2015 年及以后的工作情况：技术、移民、贸易和教育。

本期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全球经济形势下未来工作的全面情况进行了探究。IMF 经济学家普拉卡什·洛嘉尼首先对全球就业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就业复苏缓慢的原因。其他的文章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就业展望 (爱德华兹)、移民 (奥兹登)、技术 (贝森)、劳动力市场趋势 (恩斯特) 以及欧元区的失业情况 (巴纳吉)。

为实现促进就业计划，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夏朗·巴洛为就业和工资带动的全球复苏强烈辩护，而 IMF 研究人员雅莫特和奥索里奥·布依特隆则分析了工会会员减少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此外，IMF 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帕尔在“直言不讳”栏目中讲述了我们能从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的财政政策和强权政治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威廉·怀特阐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本期内容还包括增长预测陷阱和税收非正规性。

最后，不能不提《金融与发展》前总编劳拉·华莱士对拉古拉姆·拉詹的采访，拉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任印度央行行长，这对印度和全球经济都很重要。

杰弗里·海登
(Jeffrey Hayden)
主编

44 **观点：失灵的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经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在现行（非）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不平衡无法得到解决
威廉·R. 怀特

50 **直言不讳：谨慎者的诅咒**
如若没有适当的公共机构，强权政治的诱惑会危及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
维托尔·加斯帕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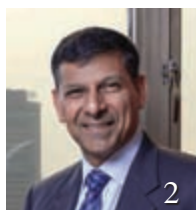


52 **减少非正规性**
作为一句口号，它可能很响亮，但作为税收改革的实际目标，它却毫无价值
拉维·坎布尔、迈克尔·基恩

55 **如何为拉丁美洲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拉丁美洲及其面临的挑战
阿德里安娜·劳瑞娜·罗哈斯·卡斯特罗

其他内容

2 **经济学人物**
金融断层线的发现者
劳拉·华莱士采访富有远见的金融经济学家、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



38 **货币**
挪威：设计、民主与胆识
克里斯托夫·考克利

48 **回归基础**
实践中的税收制度
制定公平、高效的收入制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鲁德·迪·穆伊、迈克尔·基恩

56 **书评**
《疯狂的市场：百年石油恐慌、危机和崩溃》，
布莱克·C. 克莱顿
《气候冲击：全球变暖的经济后果》，
赫尔诺特·瓦格纳、马丁·威兹曼

插图：封面，第 6、7、8、12、16、20、26 页，Richard Downs；第 11 页，ThinkStock；第 24—25 页，ThinkStock。
摄影：第 2 页，Umesh Goswami；第 29 页，Toby Melville/Reuters/Corbis；第 32 页，ITUC；第 38—39 页，100 挪威克朗正面设计提议：X-BOW®，Ulstein Design & Solutions AS 拥有设计所有权；500 挪威克朗正面设计提议：Colin Archer (船的设计)，摄像师 Anders Beer Wilse 以及摄像师 Linn Krogh Hansen；其他所有货币，挪威银行；第 40 页，ThinkStock/Getty Images；第 45 页，ThinkStock/Getty Images；第 50 页，Krzystof Rucinski；第 52 页，Yiorgos Karahalas/Reuters/Corbis；第 55—57 页，Michael Spilotro/IMF。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 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金融断层线的发现者



劳拉·华莱士
采访富有远见的金融经济学家、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

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 现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 曾是 IMF 最年轻的、也是首位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然而, 在 2003 年当不惑之年的拉詹出现在 IMF 华盛顿总部时, 许多同行都认为他选错了地方。这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是要任 IMF 新的经济顾问和研究部主任。尽管他是一名声誉很高的金融经济学家, 但他所就职的岗位此前一直由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担任。当时, 对于在 IMF 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诸多宏观经济学家来说, 拉詹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不过, IMF 选择拉詹出任首席经济学家是有原因的: IMF 希望能够增强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金融专业知识。时任 IMF “第二把手” 的第一副总裁安妮·克鲁格 (Anne Krueger) 当时正巧阅读了由拉詹与路易吉·金格尔斯 (Luigi Zingales) 合著的一本名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2003 年) 的书, 于是她联系了拉詹。当被问及是否有意成为首席经济学家时, 拉詹说他是这样对安妮说的: “安妮, 我对宏观经济学一窍不通”。对此, 安妮·克鲁格打趣道: “大家彼此彼此。” 于是, 拉詹决定一试, 并立即参加了面试。

十年之后, 在拉詹就任印度储备银行 (RBI) 行长的首日, 没有人再质疑他是否选错了地方。1991 年, 拉詹写了一篇关于银行与公司关系密切的危险性的博士论文。自此以后, 他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他最终就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 他在 IMF 的工作经历赋予了他在政策制定和参与发达经济体经济事务方面宝贵的工作经验。正如此前他的一位同事所说, 拉詹之所以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 是因为他对所有工业大国都“不畏惧”。此外, 早在 2007 年金融危机袭击美国并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之前, 他就对金融创新所存在的风险给予过严

重警告，而当时仅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此警告。

国内外对拉詹的要求和期望值都很高。目前，在印度极力恢复其经济强劲发展势头之际，他被委以执掌印度央行的重任。世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也希望他能就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指导。不足为奇的是，尽管这位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主张自由市场，但正如他在2003年出版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的，他同时认为市场是一个“脆弱的机制，政府既不能过多干预，也不能不干预。”

即便如此，很难将拉詹归为某个特定的经济学派。他喜欢自称为“务实主义者”。他告诉本刊：“决定结果的不仅是经济体制，还包括影响经济体制的政治因素，但人们对政治层面的认识程度远远低于对经济体制的认识。因此，当你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引导的过程。我如何确保那些合理的经济体制能被广泛接受？”

拯救资本主义

拉詹于1963年出生在印度中部的博帕尔市。不过，他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印尼、斯里兰卡和比利时度过的（他的父亲当时在印度外交部工作），11岁时才回到印度。他说，他对金融的浓厚兴趣可追溯至在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德巴德分校读研究生的日子。此前，他在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荣获工程学学士学位。拉詹回想起自己阅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期权理性定价理论”（计算期权的一个公式，期权是指让买家有权在今后以某个设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某项金融资产的合约）时的情景。他说，他不仅被该理论的“数学之美”（mathematical elegance），同时也被该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所深深打动。1991年，他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金融博士学位，并成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助理教授——这两座商学院都吸引了世界顶尖的期权定价研究学者来此工作。

在此后12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拉詹将布斯商学院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教授银行学和金融学的同时，他与道格·戴蒙德（Doug Diamond）和金格尔斯等同事开展了此后被大量引用的研究工作。2003年1月，拉詹荣获美国金融协会授予40岁以下领先的金融研究者的首届费希尔·布莱克奖（Fischer Black Prize），以表彰他“为我们了解各个金融机构、现代企业的运行方式以及各国金融业发展的因果关系等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颁奖词指出：“甚至当许多经济学家盛赞银行金融业的优点时，拉詹在他很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中指出，银行与企业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如同在日本的情形一样。”颁奖词继续引用了拉詹与戴蒙德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指出其“将有关银行的微观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同时更加清楚地阐明了“银行在提

供流动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功能是银行易于遭受系统性危机影响的原因以及货币政策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颁奖词还援引了他和金格尔斯开展的研究工作，该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确定机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全新方法”，并表明了“在那些金融体系更加发达的国家中，依赖于外部金融因素的行业发展速度更快”，因此有助于“抨击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一国的金融体系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对其经济增长影响不大”。

“这是一个引导的过程。我如何确保那些合理的经济体制能被广泛接受？”

拉詹和金格尔斯基于上述发现写成了2003年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书中指出，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并不发达的原因是精英们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对。这些精英们担心如果金融工具的获取自由度增加，他们将会失去其地位，面临竞争。拉詹认为，鉴于后金融危机已波及至他所认为的“征税过度和监管过度的经济体”，该书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如何“让我们的经济体始终保持灵活性，以求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案”。

此后，拉詹又荣获了多个其他奖项，包括2011年获印度印孚瑟斯社会科学—经济学奖，2013年获德意志银行金融经济学奖。在法兰克福的颁奖典礼上，作为颁奖人之一的戴蒙德说，拉詹的研究工作“总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可以如何改善整个世界”。他还认为拉詹“非常地公平、公正，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是我们学院的理性使者”——戴蒙德指出，在芝加哥大学，特别是在布斯商学院，“虽然拉詹在一些富有争议的观点上立场坚定，但他几乎没有任何仇敌”。

从学术界到IMF

2003年8月，拉詹接替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就任IMF首席经济学家。拉詹承认，“这是一个有趣的转变。”他面带微笑地回忆道：“在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格夫离职后，人们的反应是：‘那个家伙是何方人士？’‘拉詹？他是谁？’”拉詹说，“我首先必须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懂点宏观经济学的”，同时他努力吸引和留住一个优秀的团队。“当人们开始纷纷想加入（到研究部门）时，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开始出现转机。”

随着全球经济相对趋于平静——自2001年年末阿根廷贷款违约以来的金融动荡最终趋于平息——拉詹得以加快对金融业的研究进度，并开始探讨如何将金融行业

面临的问题纳入 IMF 的国家经济模型中。鉴于 IMF 此前已建立了处理各种财政和货币问题的模型，拉詹的想法似乎是可行的。然而，要创建一个针对金融问题的模型，实际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在人们认为拉詹为该模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同时，该模型的建立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对于 IMF 的研究者以及整个学术界的成百上千名学者来说都是如此。

一个主要的差异在于，十年前创建一个金融模型还缺乏紧迫感，而如今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正如拉詹在 2013 年 8 月“辛迪加项目”的专栏中如此写道：“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将金融业排除在其有关发达经济体的研究模型之外。由于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以来一直没有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金融系统在幕后发挥了作用。简化后的模型表明，直至金融系统退居二线后，政策似乎才会发挥其作用。由于“羊群效应”——政策以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占据上风，金融系统因此失灵。”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说，“在如何看待金融体系、如何隔离部分风险类型以及如何获得可以让我们实时开展更多工作的数据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解这些问题了，将两者整合的工作仍在进展之中，但仍未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布兰查德说，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确信金融稳定性的真正含义”。他还担心，宏观金融模型可能仍然难以实现——“这将永远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我们今天确定的风险，也许两年过后就成为金融体系中另外一个不同的风险了”。

部分同事认为，拉詹具有纵观全局的能力，这是让他成为这些金融辩论中的关键人物的主要原因。IMF 研究部助理主任斯蒂恩·克莱森斯 (Stijn Claessens) 说，拉詹属于“少数拥有学术和专业技能的人之一，可以从具体的体制层面谈论宏观经济学和了解金融状况，同时能够发现宏观经济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方式”。芝加哥的阿尼尔·卡什亚普 (Anil Kashyap，他也是与拉詹的合著者之一) 说：“人们有关设定利率的争论往往很简单。相反，有关如何实现金融稳定性的争论则要微妙得多，其部分原因是我们尚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依赖的标准工作母机模型。拉詹的一大优势是对金融体制以及哪些地方运行良好，哪些地方存在挑战具有清楚的认识。我认为，这是他在许多有关金融稳定性的辩论中一直保持领先的主要原因。”

在杰克森·霍尔的最终较量

不过，拉詹的观点并非总是得到认可。2005 年 8 月，拉詹在发表了有关金融体系潜藏的风险的预见性演讲后，

拉詹的警告未得到重视

拉古拉姆·拉詹可否借助什么东西来确保他的观点在杰克森·霍尔得到认可？拉詹认为没有，其原因有两个。

首先，由于当时经济状况良好，很难说服人们采取措施来减缓增长，以应对低概率的风险。毕竟，此前美联储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曾应对过互联网危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另一个危机爆发，美联储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加以应对——即便此次的问题是银行信贷，而非市场价值的丧失，”拉詹这样告诉《金融与发展》杂志。

其次，拉詹的讲话是在向当时即将卸任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致敬的宴会上发表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体系的关键参与方没有选择偏离自身目标路径的动力。”他的看法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要以其他方式极力说服观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拉詹说，“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他们来自高盛，来自摩根大通。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这个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毁掉他们的业务呢？而我们呢？我们只是低收入的监管方，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对他们业务的了解情况超过他们吗？不，事实上，我们没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多，不过我们拥有不同的动机。他们已陷入狂热的竞争之中，而我们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

遭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举行的由央行行长和其他高级经济学家参加的年度研讨会上，拉詹应邀就金融体系在艾伦·格林斯潘（当时他即将卸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的治理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发表了演讲。他说，他曾希望看到金融市场的急剧扩张会降低各大银行的风险，然而他的团队所收集到的数据显示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当着格林斯潘的面，拉詹以他的论文《金融发展是否使世界更为危险？》为基础发表了演讲。他警告说，近来的金融创新（如作为债务违约保险的信用违约交换）可能导致“出现毁灭性崩溃的更大（尽管仍然较小）可能性。”在随后的几个季度，该信息并未被顺利接受。前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认为拉詹的预言“有点反对技术进步的意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误导性”。现任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 (Donald Kohn) 认为，拉詹怀念以往由银行所主导的金融系统的日子——而拉詹强烈否认了这一点。

拉詹曾经写道，他在离开怀俄明时是有些焦虑不安的，不是因为受到批评，而是因为“这些批评者似乎忽略了未来将发生的事情”（见专栏）。几年之后，他的警告成为现实：2007 年美国次贷抵押证券市场开始崩溃，并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然，拉詹在 IMF 的时间远远超过他在杰克森·霍尔的时间。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在职学习体验过程，在此期间，他使自己的宏观经济技能更加娴熟。他还专心致力于研究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他率领一个团队尽

力帮助部分主要经济体降低其（前所未有的）巨额收支逆差。这也是他首次担任管理者——当时研究部的共有100人。不过，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似乎太小了——目前在印度储备银行的下属员工达到了17000人。

拉詹此前在IMF的同事说，拉詹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的谦逊、正直、好学和严谨。IMF研究部副主任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说，拉詹“会让下属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将所有的荣誉归功于他们，即便是在他自己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此外，他还“愿意采取引发争议的立场，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他职权允许的外部范围内都是这样，坦率地说，这种程度我以前从未见到过”。

2006年12月，在与IMF的合约到期后，拉詹重返芝加哥。在那里，他有时间，同时也获得了学术上的自由，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金融创新带来的影响。《断层线》即是他的研究成果，并荣获2010年《金融时报》和高盛最佳商业图书奖。拉詹警告不要让金融业（“发疯了的银行家”）成为金融危机的替罪羊，这是因为责任取决于各种复杂且分布广泛的断层线，包括以下方面：

- 导致宽松信贷政策的国内政治压力（源自收入不平等）；
- 依赖于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的出口型增长战略（如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国）；
- 认为政府终将出手相救，从而承担更大的金融风险。

返回印度

拉詹可以在美国继续其职业生涯，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印度，并经常以印度为其演讲和研究的主题。他说自己之所以学习经济学，是因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以帮助印度进入“大国之列”的途径。2008年，拉詹担任一个有关金融业改革的高层政府委员会主席，得以有机会帮助重新打造印度的金融行业。该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一百个小步骤》（A Hundred Small Steps）称，印度储备银行应针对一个单一的目标，即稳定的低通胀率，而非同时针对多个目标（如通胀、汇率和资本流动等）。

该报告还提议印度应面向更多人口推动金融服务（包括信贷、储蓄和保险产品等）的可获取性（特别是农村地区——这里的绝大部分人口无法获得正规的信贷和保险等服务）；减少政府对银行系统的大量干预；并且加快外资参与印度金融市场的步伐。

拉詹在芝加哥担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五年顾问，在孟买担任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一年后，2013年9月正式掌舵印度储备银行。彼时，由于印度通胀水平不断上涨、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巨大、经济增长放缓，印度市场处于动荡之中。不过，拉詹快速采取措施稳定了印度卢比的汇率，显著降低了通胀水平，并逐渐增加

了外汇储备——使他在当地媒体赢得了“摇滚之星”的绰号。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设定通胀目标奠定基础，并实施了“一百个小步骤”中建议的许多其他改革。

拉詹希望印度储备银行能够通过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帮助印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此过程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希望拉詹能够鼓励印度储备银行“更具试验性”。在拉詹之前，巴苏担任印度首席经济顾问，他说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在主要工业国中发挥良好作用的货币实践，尽管央行引导各个经济体发展的风险很大，“许多央行通过遵守这些规则来控制该经济体的发展”。巴苏说，各央行的负责人可能会说，“这个政策在富裕国家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在我们的国家可能行不通，我会在利率方面采取稍微不同的干预政策”，尝试“新的政策，看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可行。而鉴于拉詹的背景，他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拉詹可以在美国继续其职业生涯，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印度。

2014年年初，拉詹在全球金融界引起广泛关注。当时，他在接受印度彭博电视的采访中，“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失败”——实际指美联储暗示正考虑撤销此前为重振美国经济所采用的部分刺激措施。此后，他公开指责几大央行仅仅关注对其本国经济有利的政策，而未考虑其低利率政策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的金融动荡因素。新兴市场经济体被迫应对那些为寻求更高投资收益率的资金的大量流入。他呼吁那些资金来源国的央行“重新审视其政策，考虑其低利率政策对资金接受国对策（如持续的汇率干预措施）的中期影响。”

正如拉詹在2013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所做的演讲中所说：“在这个资本大量流动的一体化世界，各个大国的货币政策成为全球共同的‘油门踏板’。即便油门踏板全部踩下去，作为大国的‘汽车’也可能陷入深沟里出不来，而作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汽车’则可能突破其最高时速。如果全球各国难以避免大国央行非常规政策导致的溢出效应，这些大国的央行是否应该消化这些溢出效应呢？如果是，又该怎么办？这在政治上可行吗？”

目前，拉詹拥有一个大部分学者很少能够获得的机会，可以将自己长期以来所宣扬的理念付诸实施。印度储备银行（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行）可能并非全球动力最为强劲的“跑车”，但是对于拉詹来说，这次是其一生中成为“典范驾驶者”的绝无仅有的机会！■

劳拉·华莱士（Laura Wallace）是信息交流顾问，曾任《金融与发展》的主编。

工作，工作，还是工作！

普拉卡什·洛嘉尼

教育、移民和再分配是长期解决全球失业问题的关键要素

如今，全球失业人口超过 2 亿。

在本期《金融与发展》中，安嘎纳·巴纳吉的《欧洲失业问题》与本人的《七载低迷》两篇文章中论述道，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是一个迫切的挑战。但是该挑战将超越短期范围。在未来十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预计将需要为那些目前失业和预期加入全球劳动大军的人们提供 6 亿个工作岗位。

对岗位不足以分配的担忧是长期存在的。例如，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就预测了廉价外国劳动力对

美国的威胁：

“机器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充斥着每个市场的日子并不遥远。数百万中国人和数百万印度人将提供廉价的机械劳动力。他们好比是我们唇边一杯满满的苦茶，如果我们不能智慧地应对，就只能将其一饮而尽。”

这篇出现在 1879 年的文章表明，虽然离岸外包和外包这两个术语可能比较新鲜，但其背后隐含的焦虑（即对贸易的恐惧）却一直存在。尽管在 19 世纪 70 年



有证据表明“工人只是被分配到需要新技能的岗位，而不是完全被取代。”需要的新技术为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补充新技术的技能，这些技能目前还不能轻易地编入机器人程序中。

在过去 20 年中，发达经济体并未平等地获得由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的岗位明显地被掏空，而这些丢失的岗位主要在制造业部门。这些趋势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的加剧被记录在本期埃克哈德·恩斯特所著的《萎缩中的中产阶级》一文中。恩斯特还分析了在未来几十年这些趋势将如何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中发生演变，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将有“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薪水，但可能仅针对拥有适当技能的人”。

要解决全民就业的难题，通常提倡三种解决方案：教育、移民和再分配。这三种方案都不简单，也不完美，并且后两种方案通常缺乏政治支持。

教育能够使技术成果受益于更广泛的人群。《就业与技术》一文提供了具体实例，说明了企业、贸易协会和政府为培养“参与数字经济的美丽新世界”所需的新技能而采取的行动。但教育和技能的获得无法一蹴而就，因贸易和技术而失业的人们暂时还需要一些帮助才能勉强过活。

原则上，移民可以充当全球岗位创造难题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高技能工人可以缓解美国的短缺局面。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护士可以帮忙照看日本的老齡化人口。根据本期杂志中卡格拉·奥兹登所著的《移民政策——任重道远》一文中所述，与经济层面上的理想状态相比，移民仍未被广泛采纳。但是，尽管移民为目的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奥兹登的文章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反对移民的呼声却十分强烈且日益高涨。

要帮助那些可能因移民而损失或者得不到太多好处以及因贸易和技术而失业的人们，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包括加大对受益人群的再分配。对于职业寿命即将结束的下岗工人而言，再分配可能是比获取新技能更实际的解决方案。然而，尽管人们对不平等加剧表示担忧，再分配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少政治支持。

总之，全球劳动力市场远未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虽然世界资本流动之路可能笔直平坦，但劳动力流动之路却障碍重重。■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的顾问、IMF就业和增长项目的负责人。

代以及之后的每个十年都面临廉价劳动力的威胁，美国的平均收入却稳步增长，目前达到了每年约5万美元，是普通中国人和印度人收入的好几倍。

除了对于廉价外国劳动力的恐惧，另外一种担忧也并不新鲜，那就是技术是“就业杀手”。今天的头条新闻宣称，在未来十年内，“1/3的工作将被软件或机器人取代”。在本期《金融与发展》中，詹姆斯·贝森所著的《就业与技术》一文正面地解决了这种担忧。他得出结论说，“即使对广泛的技术性失业存在担忧”，

七载低迷

得益于各国政府有力的应对政策，全球经济正从失业率高峰中缓慢复苏

普拉卡什·洛嘉尼

2007年，经济大衰退的爆发导致全球失业率攀升，达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到2010年，全球新增失业人口已达3000万，其中约有3/4出现在高收入经济体中。

过去曾受到全球经济衰退冲击的新兴市场及低收入国家这一次却显得更具活力。新兴市场的失业率几乎没有受到影响（2010年仅增长了0.25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的失业率则出现了下降。

自2010年起，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这种复苏并不均衡。目前全球失业率已恢复至2007年经济衰退前的水平，约为5.5%。2010年，高收入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上升至8.5%，随后缓慢回落至目前的7.5%（见图1，左图）。去年，美国的就业增长较快，但欧元区则相对停滞，该地区是造成全球就业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见图1，右图）。

“结构派与周期派”

2009—2011年间，《斯莱特》（Slate）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有“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就高失业率的原因展开了辩论”。

阵营之一的“周期派”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说造成失业率走高的原因不只是一个，那么周期性因素就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周期派带头人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写道：“为什么失业率居高不下？因为增长疲软——句号，不必多说，这就是全部原因。”该阵营认为，增长乏力的原因是需求不足，政府应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促进需求增长。

另一阵营的“结构派”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高企的原因不仅在于增长乏力，还在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量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在失业率不断增加的同时岗位空缺也越来越多。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瓦伊拉亚纳·柯薛拉柯塔（Narayana Kocherlakota）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了这种错配：

“企业中有职位空缺，却找不到适合的人才。求职者想要工作，却无法找到适合的职位。错配的潜在



原因有很多——地理、技能和人口……目前很难发现联邦政府能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把建筑工作者转型为制造业工作者。”

谁赢谁输？

四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哪一个阵营的观点是正确的呢？大量迹象显示，周期派的解释更占优势，就连柯薛拉柯塔自己也已承认了这一点。

多方面的衡量结果显示，这种错配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以美国为例，职位空缺和失业人口的错配在大衰退的最初几年呈增长趋势，在部分经济部门中表现为职位空缺的增加，在另一些部门则表现为失业人数的增加，但随后这种错配开始下降。

错配的另一衡量手段是全美各地失业率的离差。2009—2010年间，失业率离差也出现了增长，这说明一些州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州。但此后这种离差下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见图2）。劳动力参与度能否恢复，仍有待观察。

其他国家的错配迹象较不明确，但各方已达成共识，认为周期性因素是造成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

这些迹象还证实了结构主义阵营的预测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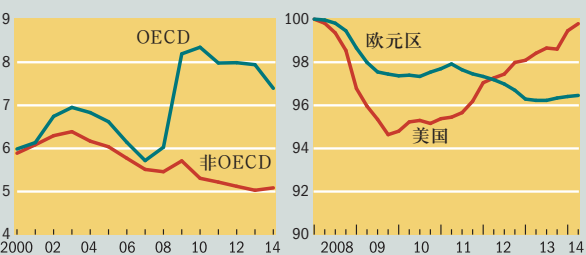
图1

乏力与增长

全球劳动力市场存在双速复苏。

（平均失业率，百分比）

（就业率，2008年=100）



资料来源：《国际就业报告》，IMF—经济学人智库—OCP政策中心，2015年1月。



结构主义者认为仅靠经济增长的恢复并不能降低失业率。在大衰退期间，工作机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依然非常紧密，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内，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见图3，左图）。该图显示了四组经济体中就业与经济增长间关联的强度，大衰退期间这种强度仍保持基本不变。

个别国家的经验也肯定了这种大趋势。例如，经济大衰退后，西班牙的失业动态可以通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间的历史关系进行预测（见图3，右图）。

政府帮忙了吗？

值得肯定的是，2008—2009年间大部分国家都作出了强有力的政策响应，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对失业的影响。首先，政府快速作出反应，出台货币政策，降低官方（“政策性”）利率，且多数政府出手对金融机构进行纾困，以此刺激产品和服务需求——进而刺激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各国政府还提供了财政刺激，其中部分通过20国集团成员国进行协调，20国集团是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组织。

德国等国家还尝试用工作分担代替解雇，以分担需求不足带来的痛苦。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延长了失业补贴的期限。这些措施降低了失业的社会成本，而且显然不会影响失业者求职的信心。

周期派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失业率的升高，这些措施杜绝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全球经济遭遇的那种严重的经济后果再次上演。据如今掌握的经验，我们很容易判断出那些恐惧只是夸大其词，但在当时我们并不具备这些经验。面对这次大衰退，各国政府迅速作出了有力的初步政策响应，它们应该为此得到赞扬。

转折点

2010年年中，一些政府开始关注公共债务的构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因经济衰退和对财政部门进行纾困而造成的税收收入下降——并开始着手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见专栏）。

各国在收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宽了货币政策。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伊万斯（Charles Evans）在2011年9月为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充分阐明了理由：

“想像一下，如果通胀率达到5%，而我们的预期目标是2%……那么任何一个称职的央行行长都会像火烧眉毛一样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积极性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如果5%的通胀率就能让我们产生紧迫感，那就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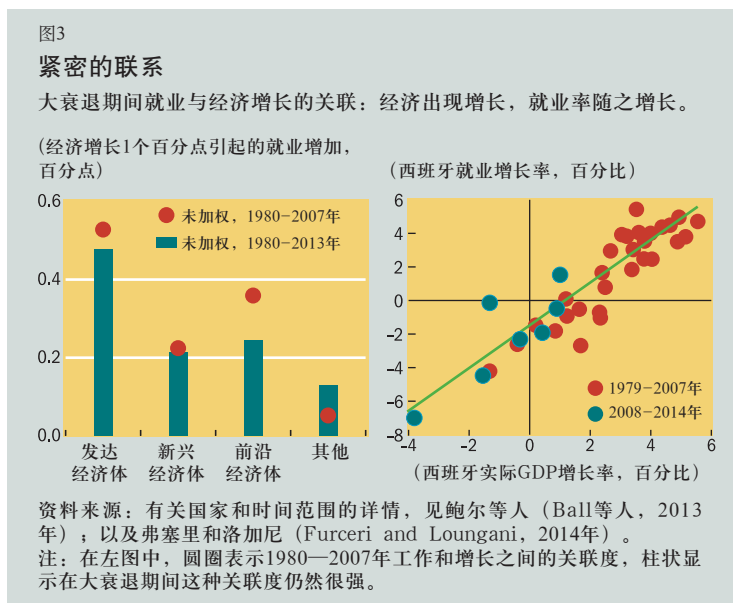
用说9%的失业率了。”

他的这番话最终导致了所谓的伊万斯规则的诞生，即2012年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作出的明确承诺——“只要失业率仍在6.5%以上”且达到通胀目标，就将政策性利率保持在基本为零的水平。同年，欧洲中央银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基（Mario Draghi）也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

未来会怎样？

欧洲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希腊和西班牙的高失业率尤其令人担忧——预计2015年这种状况不会出现明显改善（见图4，左图）。长期失业率继续走高——甚至在英美这种整体失业率已出现下降的国家中也是如此——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则被高青年失业率所困扰（见图4，右图）。

在IMF的一项研究中，有证据显示50%—70%的



青年失业增长应归因于经济增长的乏力。因此，该项研究建议：“政策重点应放在推动欧元区总需求的增长上，尤其应该采取包容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让其对必要的结构改革的实施形成补充。”（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欧洲失业问题”）。

令人振奋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已执行多项措施来支持这些需求：2015年1月，该银行声明将进一步大幅放宽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该银行已采取措施，拟通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运输、通信和能源网络的跨国投资推进经济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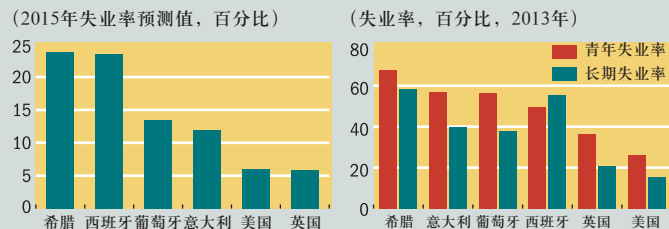
这些刺激需求的措施越来越多地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以应对大衰退之前的经济疲软。除了采取措施逐步建立银行联盟，鼓励信贷流动之外，国家层面的改革也得以推行，如开放产品和服务市场（如能源市场），以减轻监管负担、深化资本市场。

各国也在努力解决二元制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这些市场上，有的工作者拥有长期合同，享受充分的就业保障，而另一些工作者，往往是年轻人，他们以临时工合同的形式受雇，几乎得不到保障或培训机会。以意大利为例，该国目前已通过法律批准一种新的劳动合同类型，此类合同提供的就业保障会随职位任期的增长而逐渐增加，应该能够促使雇主积极尝试雇佣较年轻的求职者。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有迹象显示，长期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应远不及总失业率对经济的回应。因此，可

图4
前景堪忧

青年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预计将持续走高，令人担忧。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更新，2015年1月。

注：失业持续期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称为长期失业。

能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为长期失业人口提供帮助。卡茨 (Katz) 等人 (2014年) 建议，在经济衰退最严重时，政府应重点为长期失业人口提供失业救济和培训，而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收紧，政府应转而更主动地实施求职协助等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长期失业人口可能会面临找到工作却难以保住工作的问题，对于这类情况，有迹象显示财政激励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

失业的成本非常高昂。许多失业人口面临着持续的收入丧失和健康问题，即便找到工作，这种情况也不会马上得到改善，他们的家庭深受伤害，社会凝聚力也遭到破坏。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如政府没能快速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遏制失业增长，失业率——及相关成本——会更加令人难以承受。要拉低欧元区的高失业率，需要通过能在最大限度上驱动增长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持续提供支持。■

普拉卡什·洛嘉尼 (Prakash Loungani) 是IMF研究部顾问、IMF就业和增长项目负责人。

IMF的财政整顿观

2010年政策制定者一反以往，削减了与危机有关的支出，这个财政政策得到了IMF的支持——但这并非因为其支持“扩张性紧缩”，“扩张性紧缩”观点认为财政整顿在某些情况下有益于经济增长。相反，IMF的内部研究表明：

- 财政整顿将造成经济萎缩——即，财政整顿会降低产出，导致失业率上升；此外，IMF还对其员工是否使用正确的“财政乘数”进行了调查（即对财政整顿的紧缩作用的测量是否正确）；

- 以往的财政整顿加剧了发达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见“一剂苦药”，《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

- 在以往的经济复苏期间，财政和货币政策均向同一方向推进，共同支持经济复苏。

依据这些结果，IMF提醒各方不要过早削减财政刺激，这可能会导致刚刚萌芽的经济复苏脱轨，并建议除紧急融资制约外，采取温和、慎重的退出机制是唯一办法。IMF在设计计划时考虑了这种整顿对贫困人口的影响，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则对这项决策表示了支持。鉴于201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她表示，实施谨慎的经济整顿“是一项正确的号召”。

参考文献：

- Ball, Laurence, Davide Furceri, Daniel Leigh,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3, “Does One Law Fit All?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Okun’s Law,” *New School talk*, September 10.
- Draghi, Mario, 2012,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Global Investment Conference, London, July 26.*
- Evans, Charles, 2011, “The Fed’s Dual Mandate: Respon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U.S. Monetary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European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Centre, London, United Kingdom, September 7.*
- Furceri, Davide,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4, “Growth: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ure for Unemployment,” *iMFDirect blog*, November 19.
- Katz, Lawrence F., Kory Kroft, Fabian Lange, and Matthew Notowidigdo, 2014, “Addressing Long-Term Unemploy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Recession,” *Vox*, December 3.
- Kocerlakota, Narayana, 2010, “Inside the FOMC,” *speech delivered in Marquette, Michigan, August 17.*
- Krugman, Paul, 2011, “The Fatalist Temptation,” *New York Times blog*, July 9.
- Ledbetter, James, 2010, “Strucs vs. Cyscs,” *Slate*, August 24.

规模问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企业必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来兑现该地区的承诺

布鲁斯·爱德华兹

鉴于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众多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我们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几乎每家企业都贴出了招聘广告。然而，即便是以每年5%的速度发展，该地区的增速仍未能创造足够多的有偿工作机会，特别是农业以外的工作机会。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从业人员达到4.5亿，但正式就业人口不到4000万。这并不是说剩下的人不工作；事实上，该地区的失业率相对较低。真正的问题是要进行就业市场转型，也就是将人们从小规模的非正规工作和农场工作（这些常常是低薪或无偿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收入保障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劳工组织表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76.6%的工作者属于弱势就业群体。

作为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若希望吸收快速扩大的从业队伍，就需要各种企业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联合国表示，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将是现在的两倍以上。

潜在福祉

尽管人口的不断增多给该地区的就业市场带来了压力，但这也可能为其带来福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32%的人口介于10—24岁，这个比例是世界最高水平——国际劳工组织表示，这提供了“人口红利”，因为劳动适龄人口的生产能力将随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而飙升。

IMF的一项名为“非洲应尽事宜：新世纪就业前景（Africa's Got Work to Do: Employment Prospects in the New Century）”的研究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体若能从东亚吸引更多投资，用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行业，那么该地区用于出口的制造业产出的确会实现飞跃。但是，目前该地区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不到10%。

全球发展中心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41个国家的企业规模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规模小24%。该项研究采用了119个国家4.1万家正规企业的数据，并比较了它们历年来的生产力。

这项名为“缓慢的增长：为何非洲企业无法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的研究指出了导致该地区企业规模较小的几大可能性，其中包括家族企业不愿雇佣家族以外

的员工，以及一些行业的市场份额潜力有限。但总体而言，该研究指出阻碍该地区企业发展的原因是该地区的商业环境欠佳。

尽管有限的融资渠道和缺乏可靠的电力供应等问题是明显的制约因素，但是地区治理问题也是造成员工人数减少的一大原因。全球发展中心资深研究员兼该报告的联合作者维贾雅·德兰（Vijaya Ramachandran）表示，大企业往往是政府急需税收收入的征税对象，也是腐败官员寻求贿赂的对象。因此，“在一些国家，企业不希望扩大规模，以便不受政府的监管”。这项研究显示，对于员工超过100名的企业，其应付政府官员的负担已经显著上升。

规模小有时也是好事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正规行业是重要的税收来源，而大企业可以为养老金计划和医疗计划等社会计划提供资金。但是，由于90%的工作岗位由非正规的小型家庭企业或自给农业提供，工作者获得提供福利的正规工作的机会很小。IMF的高级经济学家阿伦·托马斯（Alun Thomas）表示：“虽然工资就业（农业以外的有偿工作）经常被视为就业政策的最终目标，但未来家庭企业最有可能提供大量的新工作机会。”

尽管小型家庭企业一般都不缴纳税收，而且经常难以以为继，但令人振奋的是，这些企业会扩大规模——比如先从雇佣邻居开始——并考虑注册企业，以便进行融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更包容的商业环境，鼓励企业家加入正规经济的行列。

最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正规与非正规企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鉴于该地区就业问题的范围，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改善监管环境，填补电力供应等关键的基础设施缺口，两个行业都依赖这些基础设施实现增长。

对数百万目前以及未来需要稳定工作的人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和更多的本地企业家是改善其生活水平的关键。■

布鲁斯·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任重道远

移民参与他
国就业市场
利大于弊



卡格拉·奥兹登

约翰是在华尔街工作的对冲基金经理，胡安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建筑工人，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特征：两人都是全球套利者。

约翰的工作是研究全球各地利率的微小差别，在键盘上轻轻一敲，数十亿美金即刻转移，而且说不定还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胡安从尼加拉瓜的马萨亚来到加利福尼亚，利用这里与本国不同但明显更大的劳动力价差赚钱——这里建筑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尼加拉瓜的12倍。他用全家人一生的积蓄支付了偷渡费用，每天生活在被抓并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之中。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三成尼加拉瓜人羡慕的对象，在2012年一项民意调查中，这些尼加拉瓜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就会移民。

约翰从近年来金融和产品市场的快速一体化中获得了收益。胡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故事。多数渴望在其他国家找到高薪工作的移民都面临着地理、文化、语言和政策性的阻碍，胡安是少数克服了这些阻碍的人中的一个。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一个最重要的例外，它造成了持久的工资差异。因此，移民比例自196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占全球人口的3%左右。巨大的工资差异不仅存在于建筑和农业等低技能部门，还存在于多个高技能职业领域（国际劳工组织，2012/3）。澳大利亚护士的工资比菲律宾护士高7倍；英国会计师的工资比斯里兰卡的高6倍；美国医生的薪水是埃及医生的6倍，以上均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

公众认知

低水平的全球迁移、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巨大工资差异显示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孤立性以及移民对工资的影响甚微。

但公众的认知却并非如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收入国家中，许多人认为移民问题是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将工资下降和高失业率归咎于像胡安这样的移民工作者。

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如何？移民争论的核心主题是误解和无知。英国伊普索斯莫里民意调查机构（Duffy 和 Frere-Smith, 2014 年）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英国民众认为移民占全国人口的24%，而实际数据是13%。美国（32%



对13%)、法国(28%对10%)和西班牙(24%对12%)对移民数量的认知差异更大。这种认知偏差反映了大众对移民的情绪。

迁移模式

在探讨移民对就业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现实中的迁移模式。1960—2010年间，全球移民数量从0.9亿增长到2.15亿——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保持在3%左右。其中2/3的增长来自西欧和美国移民的增长。另外1/3的增长包括前苏联国家间的人口迁移，新兴移民目的地国家——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国家的移民，规模庞大的非洲内部迁移，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为目的地的国家的移民。部分经济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南非和土耳其，已成为吸引难民和求职者的热点区域。

较高水平的南北迁移是过去50年的移民特征。OECD和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呈现了值得关注的向OECD国家迁移的模式，大部分争议焦点集中在移民和就业市场的关系上。截至2010年，OECD国家移民达1.13亿，与过去十年相比增长了38%。移民人口占OECD国家人口的11%，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引发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焦虑。OECD成员国家间的人口迁移约占其总人口的40%，其余移民来自拉丁美洲(26%)、亚洲(24%)和非洲(10%)。

移民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移民的技能结构。在OECD国家中，移民被平均分为高等学历移民(30%)、中等学历移民(36%)和初等学历移民(34%)。与本国人口相比，移民中的高等学历工作者的人数过多(本国人口中该比例为23%)，但中等学历工作者的人数不足(本国人口中该比例为41%)。

各OECD国家的相关数据存在很大差异，难以一概而论，并且对其进行一概而论也是很危险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瑞士，移民人数超过总人口的25%，而日本的移民人数仅占其总人口的1%，几乎难以察觉。以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为目的地的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约占OECD国家高等学历移民总数的70%(见图)。

移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对不同的推拉力量的响应。只要还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数以百万计的像胡安一样的移民就会奋不顾身、跋山涉水冲往高收入国家。移民与本国劳动力市场条件能够互相影响，因此经济分析必须对这些反馈机制作出说明(如欲了解学术文献优秀评论，见Borjas, 2014年)。

对就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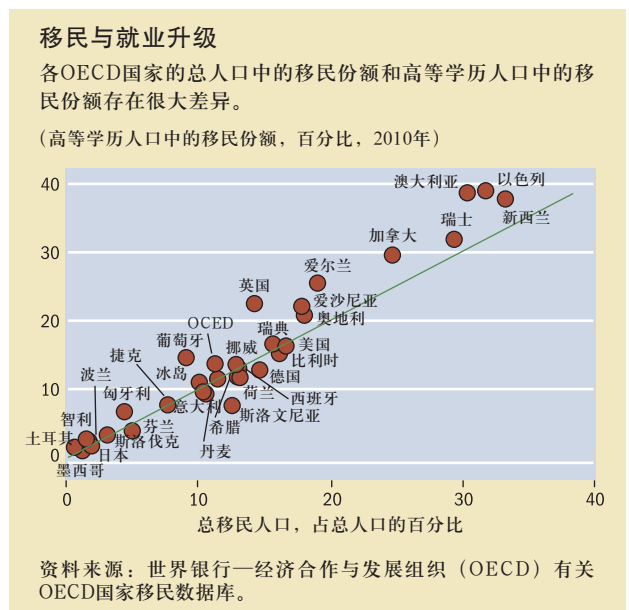
移民创造就业机会还是会破坏就业机会?此问题中的就业机会是指本国工作者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指一个国

家的总体就业机会。在所有接受测验的对象中，60%的英国和美国民众、50%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民众以及40%的法国和印度民众认为移民剥夺了本国工作者的就业机会。由于金融危机给OECD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难怪过去十年间政府官员的反移民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除政治和公众认知之外，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但数据显示，工资和就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奥塔维阿诺和派里的一项相关研究(Ottaviano和Peri, 2008年)受到了广泛认可，该研究发现在1990—2006年间移民使美国本国工作者的工资平均增长了0.6%。但是鲍哈斯和卡茨(Borjas和Katz, 2007年)认为这种影响约等于0。很显然，无论从哪个研究结果上看，移民对工资的影响都极其微小，欧盟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以道克奎尔、派里和奥兹登(Docquier, Peri和Özden, 2014年)的研究为例，他们发现，在德国和法国，新移民(1999—2000年移民)将平均工资提高了约0.3%，在英国提高了0.8%，对其他大部分欧盟国家而言，新移民带来的平均工资增长介于此两者之间。最激烈的移民批评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也承认新移民给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微小的积极影响，他的反对观点完全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和凝聚力观点的基础上。

移民对工资的影响极其微小。

这种分析虽有精辟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些结果均为平均值，因此可能掩盖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影响。一些群体，如不具备竞争能力且不太可能掌握新技能的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男性工作者，受到的冲击最大。





其次，这些工作者中的许多人可能宁愿退出劳动力大军，也不愿接受降薪。对他们来说，提前退休、残疾或失业救济金可能更有吸引力。如果在进行分析时未对这种半自愿失业类型进行说明而是只侧重在职者的工资，那么这种影响就不会体现出来。再次，这种分析体现了总体

形势，忽略了行业差异。许多职位被移民工作者占据，只是因为他们比本国工作者更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所以从总体上看对高中学历的工作者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机器操作员等工作者有影响。

大部分劳动经济学家都认同移民并不是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作者近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问题的主要原因。技术创新、离岸外包、金融波动、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都比移民带来的影响更大。移民只是碰巧受到关注，并且对于政客和公众来说，他们是更容易攻击的替罪羊。

动态效应

虽然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极其微小，并受到广泛认可，但最近的研究仍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行为变化的动态效应。重要的是，移民是如何融入目的地的劳动力市场的——他们是否能够补充或代替本国工作者的技能，他们占据的职位类型，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本国工作者在择业、教育决策和其他劳动力市场选择方面作出的响应。这些因素都具有长期的影响力，有必要进行仔细分析。

美国如同一个有用的实验室，供相关人士研究这种动态效应。移民人口占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6%，但这些移民均集中就职于部分职业领域。例如，在与建筑相关的多类职业中，移民工作者占60%，而农场工人和屠宰工人中大部分为移民工作者。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医学、物理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医生和经济学家中有1/3为外籍工作者。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间逐渐上升，说明移民已经专门从事技能范围两端的工作。在这些职业中，本国工作者似乎较为缺乏。美国所需要的医生、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建筑工人和农场工作者、家庭工人的数量超出了当前工资水平下愿意或有能力填补这些职位空缺的本国工作者数量。

本国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职业中的本国劳动者——可能会作出的响应是退出劳动力队伍，享受福利国家提供的慷慨失业救济金。或者，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乔凡尼·派里 (Giovanni Peri) 在他的多篇文章中所提出的，移民可能会通过占据本国工作者的重复性体力工作而

迫使其向更加复杂的工作转移(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就业与技术”)。这种岗位升级对于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至关重要，在劳动法规弹性较大的国家中较为普遍，比如英国和美国。这种职业间的劳动力再分配也会出现在高等教育工作者之中。高学历移民在迁移时会选择对定量和分析技能要求更高的职业。外籍工作者份额上升后，拥有相似学历的本国工作者会选择分析性较弱但对沟通和管理要求更高的职业。

移民和本国工作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互补性，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和波士顿大学的马西斯·瓦格纳 (Mathis Wagner) 在一项来自中等收入移民接收国的罕见研究中发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低技能工作者的移民震动了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市场。1990—2010年间，马来西亚采取卓越的国家教育计划，将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口份额从50%提高到80%。因此造成的低技能工作者的短缺由大量移民工作者补充，这些移民通常从事建筑业、种植园业和外向型低技术制造业。拥有高中学历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变成了这些移民工人的管理者。我们发现，每10位移民工作者的迁入会给马来西亚本国工作者带来7个中等技能职位。如果没有这种人口迁移，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不会获得与他们的学历相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无技能移民的大量供应促使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加大自身教育投入，以突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更大限度地利用技能的互补性。

这种互补性影响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在许多国家中，女性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工作，因此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涉及比男性更复杂的权衡取舍，很多女性，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选择非全职工作或不工作。愿意以更低价格提供家政服务的低技能女性移民工作者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目的地国家女性的劳动力决策。波士顿大学的帕特丽夏·科尔特斯 (Patricia Cortes) 及其同事表示，外籍家庭工作者提高了中国香港和美国本地年轻女性和高等学历女性的就业水平。鉴于许多国家，包括32个OECD国家的在校大学生中一半以上为女性，这种就业创造效应对于长期经济繁荣极为重要。

这种互补性在足球界的表现也较为明显，足球行业也许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全球性劳动力市场(见“足球，足球”，《金融与发展》2014年3月号)。去年夏天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全世界最优秀的736名球员齐聚巴西，当时他们代表的是32个国家队。但这些足球明星中几乎有一半同时效力于英格兰超级联赛、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92名非洲球员中仅有6位效力于本国足球俱乐部。

研究实验室、大学和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工作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技能的聚集提高了生产率，进一步扩大了经济活动。皇家马德里、谷歌、纽约交响乐团和好莱坞都从这种互补现象中受益，并成为提供卓越产品的全球知名

品牌。由于这种溢出效应，我们很少在高技术群体中看到反移民的现象，高技术群体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同等水平的移民工作者合作时带来的个人生产率的增长。

赢家与输家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重点放在移民创造就业机会的渠道上，特别是本国工作者和移民工作者间的劳动力互补性这一渠道。移民的整体影响趋向是积极的，绝不存在多数公众舆论所认为的危害性。移民选择的职业是本国工作者所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包括工程教授、水果采摘员、对冲基金经理和建筑工人。

移民选择的职业是本国工作者所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

但与任何经济活动一样，有赢家就有输家。葡萄牙超级球星C罗加盟皇马时，俱乐部因此解雇了一位西班牙本国球星。一部分小学学历的马来西亚建筑工人无力与菲律宾移民工人竞争，而且年龄过大，已经无法学习新的技能。在美国，因墨西哥移民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许多本国保姆失去了工作。

公众对移民抢走就业机会的感知非常强烈，因为失业这种后果对于大家来说显而易见，对于受到直接影响的失业者来说尤其如此。移民对就业机会的创造效应相对不易察觉。印尼劳工的马来西亚主管、美国的女企业家之所以能够留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是因为他们家中有一位称职的外国保姆，但他们很少会想到正是因为移民工作者的存在，自己才能享有现在的工作和工资。

劳动力市场非常复杂。移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供给和需要的一种响应。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响应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复杂性。移民的影响利大于弊，因此经济学家建议采用向从中获益的胜者征税的方式对输家进行补偿。

移民造创的零星技术互补性应得到发展。尤其是高技能群体——无论是学者、工程师、影星、运动员，还是企业主管。任何国家都不应通过定额对高技能移民进行限制。相反，应为每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提供永久居留权。政府可以用收取“管理费”的形式代替移民定额限制，为能简化审核程序，企业雇主会非常乐意缴纳管理费。

几乎所有分析都忽略了移民带来的最大效益——为消费者降低了物价。家庭保洁的收费降低了，医生数量增加了，移民工人采摘的蔬菜卖得更便宜。我们没能看到移民对日常消费的影响，而经济学家也无法对这种影响进行计算。但这种效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比任何其他效应的影响力更大。我们无法专门针对移民采摘的蔬菜或移民医

生的问诊征税，因为这不合法，也不具可行性。但是我们可以征收移民就业税。这就是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复杂的移民管理政策背后的本质原因。就业签证包括向雇主收取的服务费用，这种费用取决于移民的技能水平和职业、企业规模、所处行业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条件。这种服务费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雇主、工会和研究人员也会不断提供反馈。这种收费制度与商品进口商在边境支付的关税相同。该收费制度还规定逃税将受到严厉处罚，因此能够减少无证移民的非正规失业并创造收入。

本国和移民工作者之间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且危害更大。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似乎能够更好地应对这种负面效应，但是失业人口仍然需要帮助。这就需要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税收。补偿性政策有多种形式——如，失业保险或培训补贴。但最重要的政策是通过教育鼓励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工作者——获取更新、更高级的互补性技能。

移民政策在先进性和效率方面发展滞后。国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管都是经济学家，但在移民政策方面，多数国家都“不允许经济学家的干预”。国家安全和法律问题在辩论和官方机构中占据首要地位：移民管理通常由内政部和国家安全部负责。居住权、就业权和公民身份依据法律或政治原则授予，经济条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通过将最低经济标准引入决策过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移民机制的有效性立即得到了提高。这些国家有很多经验可供欧洲和美国学习借鉴。

最佳的移民政策不会用严格的壁垒将胡安这样的移民拒之门外，而是会接纳胡安（和约翰），并对他所创造的一部分经济收益征税，再用这些税款为他所代替的工作者提供培训。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值得去做！■

卡格拉·奥兹登（Çağlar Özden）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首席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Borjas, George, 2014, *Immigration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Lawrence Katz, 2007, “The Evolution of the Mexican-Born Work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ed. by George J. Borj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cquier, Frederic, Giovanni Peri, and Çağlar Özden, 2014, “The Labor Market Impact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in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Vol. 124, pp. 1106–1145.

Duffy, Bobby, and Tom Frere-Smith, 2014, *Perceptions and Reality: Public Attitudes to Migration*, IPSOS Mori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London).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2/2013, *Global Wage Report* (Geneva).

Ottaviano, Gianmarco, and Giovanni Peri, 2008,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 pp. 152–97.

就业与技术

詹姆斯·贝森

创新技术将工作者转移至新岗位，而非完全将其取代

在美国波士顿北部的安静物流(Quiet Logistics)配送中心里，一个机器人举起一个架子，将其从仓库运送至工作站。工作站的一位员工从架子中挑起一件物品，放进运输箱里。在该配送中心，每个机器人的工作量相当于1.5个工人的工作量。

除了改变供应链，机器人及其他技术从源头一路跟踪物品直至其抵达消费者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运送时间和成本，并自动化文案工作等等。但是，这些技术会取代人类工作者，进而导致

永久的技术性失业吗？

令人惊讶的是，仓库及其他供应链设施经理却纷纷表示，他们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员工，至少找不到充足的能够使用新技术的员工。此外，他们认为这类技能短缺将在未来十年内持续存在。

新的“智能机器”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工作性质，但问题是如何改变。受人工智能驱动，新技术不仅在从事仓库工作者的工作，还接管白领工作者和专业人士的工作。自动柜员机接管了银行营业员的工作；财会软件使记账工作实现自动化。现在，计算机也能根据X光诊断乳腺癌，而且其对存活率预测的准确度至少达到了一般放射科医生的水平。

这究竟对就业和工资意味着什么？有时，新技术会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但有时这些新技术又产生对新能力和新岗位的需求。在一种情况下，新机器会完全取代工作者，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新机器仅仅将工作者转移至要求新技能的不同岗位上。过去，我们有时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来打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以大规模开发重要的新技能。

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技术的发展方向。如果技术取代了工作者，他们就要应对不断增多的失业和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但是如果技术带来的首要问题是转移，那么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发具备新专业技能的从业人员。这两个问题需要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尽管对大范围技术性失业忧心忡忡，但我认为数据表明当今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是在将工作者转移至新岗位，而非将其完全取代。在主要的职业类别中，只



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岗位一直在被取代——但这些损失被其他职业的增长所抵消。

然而，劳动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一般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而雇主则很难招聘到具备所需技能的工作者。技术带来新机会的同时，也在创造新需求，而培训机构却没有快速跟上脚步。尽管一些经济体否认缺乏拥有所需技能的工作者，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下述迹象，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打造一支会使用新技术的劳动力队伍。如果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没有及时作出调整，信息技术的巨大好处将是有限的，且无法实现广泛共享。

自动化 ≠ 失业

我之所以着重讲述信息技术，是因为该技术为大部分劳动者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人看到计算机使自动化工作成为可能，断定技术性失业在所难免。近期的一项研究（Frey 和 Osborne, 2013 年）探究了计算机完成不同工作任务的方法，并断定大约在未来十年，美国有 47% 的工作岗位很可能被自动化取代。这是否意味着近半数的工作岗位要被淘汰呢？

不可能。计算机能完成一些工作任务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就要被淘汰。以银行出纳员为例。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率先安装自动柜员机（ATM）。这些柜员机能代替银行出纳员处理一些最常见的工作任务，比如现金取款、存款等。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银行快速加大对自动柜员机的使用。现在仅美国就有 40 多万台自动柜员机。

人们也许会预计此种自动化会有损银行出纳员的地位，但实际上，随着自动柜员机的普及，银行出纳员的人数并没下降（见图 1）。相反，两大因素促使我们保住银行出纳员的岗位。

首先，自动柜员机增加了对出纳员的需求，因为其降低了分行的运营成本。有了自动柜员机之后，1988—2004 年在一般城镇市场上运营一家分行所需的出纳员人数从 20 个降至 13 个。但是，银行对此的反应是开设更多的分行，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城镇地区银行分行的数目因此上升了 43%。尽管每家分行要求的出纳员人数下降，但是更多分行的开设意味着出纳员这个岗位并未消失。

其次，尽管自动柜员机使一些工作任务得以自动化，但是其他仍未进行自动化的工作却变得愈加重要。随着银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出纳员成为“关系银行团队”中的重要一员。许多银行客户——特别是小企业客户——的需求无法通过机器来满足。与这些客户有私人关系的出纳员可以向他们销售高边际利润的金融服务与产品。出纳员的技能已经改变：现金业务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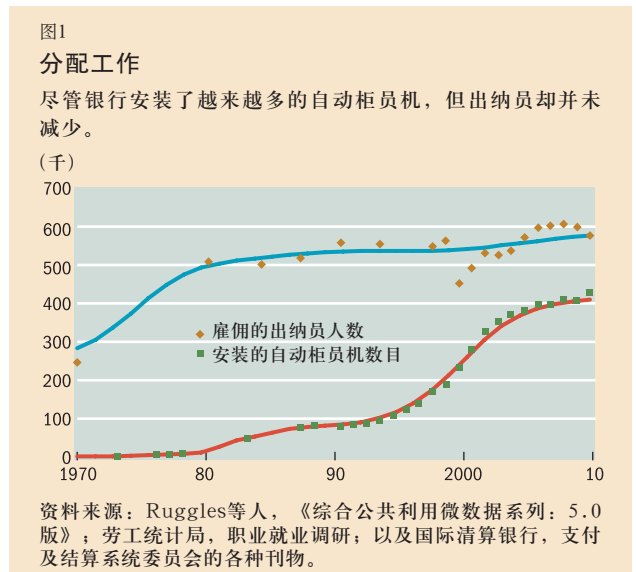
成次要工作，而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则变得更为重要。

简言之，经济对银行出纳员工作实现自动化的反应比许多人预想的要灵活得多。这并不稀奇。自动化在工业革命时期并未引发大范围技术性失业。比如，在 19 世纪，动力织机使纺织一码布所需工作的 98% 实现了自动化操作。但是，在这段时期工厂的纺织工人数却出现了增加。纺织一码布的劳动力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竞争性市场上的价格降低，而价格降低则意味着对布的需求急剧增长，进而提高了对纺织工的需求，尽管纺织一码布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此外，尽管技术让越来越多的纺织工作实现自动化操作，但是纺织工的其他技能，比如协调多架织机的工作，却变得日益重要。19 世纪末，相较于其他工作者，纺织工的工资急剧上涨。

新技术也会增加对具备新技能工作者的需求。

在其他方面，经济也作出了灵活应对。在某些情况下，技术的发展会为相关领域创造新工作。台式印刷系统虽然让印刷工的人数减少了，却创造了更多的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岗位；企业电话系统自动化意味着接线员的人数减少，但接待员的人数增加，接待员负责之前接线员所从事的与客户互动的工作。有时，新工作也会来自完全无关的行业。比如，随着农业岗位的消失，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岗位却增加了。

因此，计算机自动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即会出现大量的技术性失业；新技术也会增加对具备新技能工作者的需求。要衡量计算机技术对整体就业的实际效应，我们必须研究主要的职业类别，来了解工作转移





至相关职业时，计算机技术对整体就业的净效应。

图2按照计算机使用频率降序，列出了五大主要职业类别中工作岗位的年增长率；截至2001年，在前三大职业类别中，每一类别使用计算机的工作者人数均超过一半。在三种使用计算机最频繁的职业类别中，工作岗位的增速快于整体从业队伍的增速。换言之，计算机的确使某些职业中的工作岗位消失，但是计算机对这些大职业类别的净效应并不是技术性失业。在过去30年间只有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出现了净损失，损失数目达到500万个。但是这些损失被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增长所抵消。

简言之，自个人电脑出现后的30年里，技术并未完全替代工作者。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一些人，比如科幻小说作者兼退休数学教授和计算机科学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认为，我们正在走向“技术奇点”：在大约未来十年，计算机将比人类更“聪明”。他们表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那么技术就会大范围取代人类工作者。或许他们是正确的，但是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却对此表示怀疑。

新技术当然会代替人类从事更多的工作，但是人类的很多品质在全球商业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计算机可以选择股票投资组合，但是金融顾问却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提供安抚。尽管计算机能建议您该购买何种产品，但是销售人员却了解消费者需求，而且会让其相信未来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会得到恰当地处理。尽管计算机能够正确地作出医疗预测，但是它们不会安慰病人，不会指导他们作出困难的医疗选择。而且计算机科学家不认为计算机能在短期内获得这些能力。

新技术当然会代替人类从事更多的工作，但是人类的很多品质在全球商业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计算机可以选择股票投资组合，但是金融顾问却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提供安抚。尽管计算机能建议您该购买何种产品，但是销售人员却了解消费者需求，而且会让其相信未来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会得到恰当地处理。尽管计算机能够正确地作出医疗预测，但是它们不会安慰病人，不会指导他们作出困难的医疗选择。而且计算机科学家不认为计算机能在短期内获得这些能力。

虽然技术性失业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但目前还不是一个大问题，也不可能成为近期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即使信息技术目前正在给员工和雇主带来实际问题，政策制定者也不应专注于应对未来技术性失业这个定义不清也不确定的威胁。

新技术、新技能

表示难以找到能使用新技术的工作者的高管并非只有供应链经理。美国公司万宝盛华集团对全球3.8万名经理进行了一次年度调研。去年，35%的经理表示难以招聘到具备所需技能的工作者。其他调研的结果与此相似。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对雇主抱怨人才短缺的现象深感怀疑。有些人，比如经济学家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认为，受过教育的工作者人数超过当前工作岗位所要求的人数。然而，工作者缺乏的技能多数与技术有关，且需要从工作经验中获取而非通过学校学习，因此雇主仍会面临教育程度高的员工技能短缺的问题。

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根本不存在技能短缺问题，因为平均工资并未增长。布鲁金斯学会的加里·伯特莱斯(Gary Burtless)写道，“除非经理们都忘记了他们在《经济学101》中所学的一切，否则他们应该知道，填补空位的一个方法是合格求职者提供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接受这份工作”，即提供更好的薪酬或福利。鉴于工资中位数并未上涨，伯特莱斯断定目前不存在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

伯特莱斯关于具备所需技能的工作者工资将大幅上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很明显他假定中位工作者已经具备了雇主所要求的技能。如果这些工作者很难掌握使用最新技术的技能，那么这一假定就不成立。这样的话，有些工作者的工资就会上涨，而另一些工作者，包括中位工作者就会发现其技能已经过时，他们的工资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降低。

发展技能实施新技术并非一个新问题。过去，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时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重大的新技术。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工资数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技能与培训得到规范；自此之后，工厂工资才开始大幅上涨。

类似的情况目前似乎正在发生。以平面设计师为例。他们一直以来都专注于平面媒体领域工作。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对网页设计师的需求出现增长；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对手机设计师的需求上升。设计师必须与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与新标准保持同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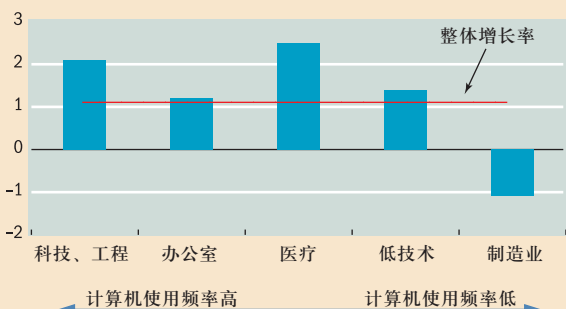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却跟不上步伐。多数图形艺术学校仍以平面设计为主要方向，他们教授的多数知识很

图2

计算机并未取代人类的工作

在使用计算机的职业类别中，工作岗位的增速快于整体劳动力队伍中的岗位增速。

(主要就业组别中工作岗位的年增长率，1982—2012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Bessen (即将出版)。

快就过时了。相反，设计师必须从工作中学习，但是雇主却往往不会对此进行激励。鉴于员工会离职、技术也会发生变化，雇主不愿意对学习进行投资。此外，由于新技术一般都不规范，在一个工作岗位学到的技能并不一定对其他雇主有用，因此这些雇主并不大幅提高工资。由于缺乏一个稳健的劳动力市场来支持其技能的发展及其长期职业发展道路，员工也不愿意自主投资。

然而，最有天赋的设计师会自己学习新的技能并建立自己的名声，让潜在雇主知晓。在美国前 1/10 的设计师中，有的挣取 6 位数的工资，有的从事小时费率不菲的自由职业。此外，中位设计师的工资变化不大，毕竟中位设计师仍然主要从事平面设计工作。雇主会为拥有所需技能且声誉卓著的设计师支付高额工资，但在培训和劳动力市场机构跟上步伐之前，这类设计师的人数比较有限。30 年以来，中位设计师的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完全是因为这些机构未能紧跟不断变化的技术步伐。

技术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正因如此，这一行业的经济不平等情况日益凸显：前 1/10 的设计师的工资与中位设计师的工资之间的差异日渐拉大。其他受计算机影响的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图 3 显示了计算机密集行业对特定工作者的需求不断上升。蓝色柱状显示了每个职业类别 90 分位从业者相对于中位工作者的工资增长情况。对办公室和医疗行业，前 1/10 工作者的工资增长非常迅速，这表明

这些工作者拥有十分重要的技能，而这些行业的一般工作者不具备这些技能。就这些通过经验和教育获得的技能而言，在计算机密集型行业，老员工的工资增速快于新员工（红色柱状），同样，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作者工资增速快于高中学历的工作者（绿色柱状）。

这些数据表明，雇主的确增加了员工的工资，但仅针对供职于计算机相关行业、拥有特殊技能的工作者。在这些工作者中，很多都是在工作中自己学习技能的。但是普通工作者却觉得难以掌握新技术所需的知识。

政策影响

新的信息技术的确为经济带来了一个问题。然而，截至目前这个问题并不是大量的技术性失业，而是一般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且雇主找不到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工作者被转移至需要新技能的工作岗位上，而非被技术完全取代。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非常实际：技术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但是，企业、贸易协会和政府可以通过出台正确的政策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能短缺问题。

比如，被称为 MHI 的美国材料处理协会推出了一项计划，鼓励四年制大学、社区大学、甚至高中开展专业培训计划。行业协会制定了一份技术“路线图”，呼吁各方对来自其他行业的工作者进行再培训，并向该领域引入人口结构多样化的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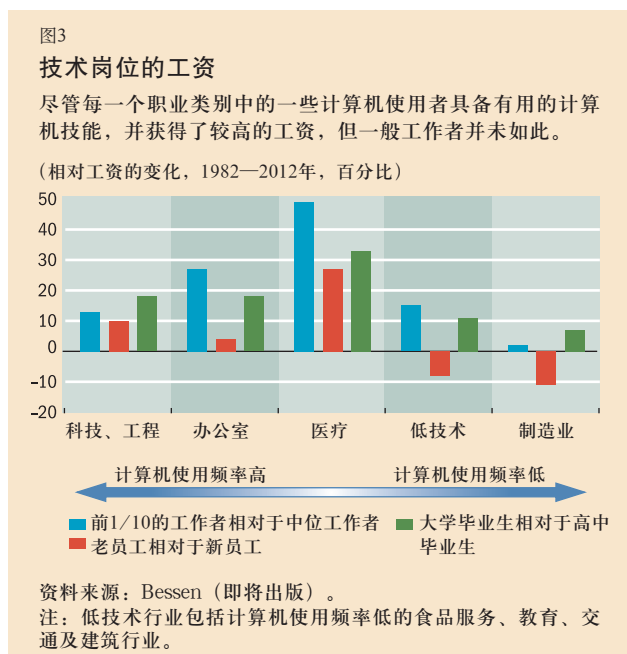
这份路线图指出，一些关键技能无法从学校习得，必须通过经验习得。为了培养那些从工作中学习的工作者的职业道路，该机构提议要通过一个国家中心来认证这些技能。路线图还提议，企业间要增强协作和信息共享，以便规范技术和技能。

信息技术革命可能会加速。未来人工智能软件将赋予计算机大量新能力，因此计算机有可能取代数百个行业的工作岗位。但这一进展不是陷入“工作末日”这一绝望的原因。相反，正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专注于政策，以帮助大量工作者获得应用这一新技术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课讲师。本文摘自其即将出版的新书《边做边学：创新、工资与财富之间的真正联系》（*Learning by Doing: The Real Conn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Wages, and Wealth*）。

参考文献：

Frey, Carl Benedikt, and Michael A. Osborne,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Oxford Martin Programme on the Impacts of Future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Oxford, United Kingdom).



萎缩中的中产阶级

埃克哈德·恩斯特

劳动力市场趋势对一些劳动者而言是天堂，但是对大部分劳动者而言却仍是炼狱

全球工薪阶层似乎陷入低迷。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而且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为了给目前超过2.01亿的无业人员以及即将求职的人提供工作机会，未来十年必须产生6亿多个工作岗位（ILO，2015年）。

尽管一些国家最近失业率明显改善（如美国），但是绝大部分国家仍在努力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而且

大量求职者压低工资水平，即使生产率（人均产出）有所提高时也是如此，这加剧了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状态。

但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长期转变——如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不断减少、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劳动力不断萎缩——正在改变全球的劳动力市场。目前的问题似乎是劳动力过剩，但是在未来几年，全球劳动力将会减少。这些转变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是应





该也有助于纠正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平衡现象，这些不平衡现象妨碍了劳动者分享生产率收益。然而，受益的主要是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前景不太乐观，这不仅对他们来说是个坏消息，而且也不利于为减少不平等而作出的努力。

不平等可能加剧

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持续恶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自2014年《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皮克迪）出版以来，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政策辩论的焦点。平心而论，以前就有人注意到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例正在上升，劳动者收入所占比例正在下降。但是，在过去这些变化往往归咎于工会弱化和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在过去，这两者都被视为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增长，有望能够使所有人受益（例如，Jaumotte和Tytell，2007年）。

在一些中等收入地区，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不再显著增加。

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观点受到质疑，因为高度动荡的经济增长时期会导致收入分配偏差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使得一些观察者认为，减少收入不平等将会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更合理地分配财富这个纯粹的道德义务增加经济学原理。当前的政策辩论关注使用税收改革来解决不平等现象，但很少考虑增加所得税或房产税对就业创造、创新和增长的潜在危害（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回归基础：实践中的税收制度”）。更重要的是，该政策辩论并没有充分考虑导致不平等趋势的长期因素。

仔细分析劳动力市场趋势可以发现，就业领域正在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传统中产阶级工作岗位向高技能岗位和低技能岗位两头分化。这一转变就是引起所观察到的不平等动态的主要原因。的确，电脑和机器人似乎终于进入了生产过程的中央舞台，减少了大量常规任务工作机会。这种转变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不久前，机器人已经接管了制造业传送带。甚至在许多服务行业岗位——如会计和保健——电脑占据的工作份额更大——例如，帮助进行税务申报或充当医生的诊断工具。对于拥有与这些“常规”工作互补的技能的人来说，电脑化带来了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资的新机会（Autor，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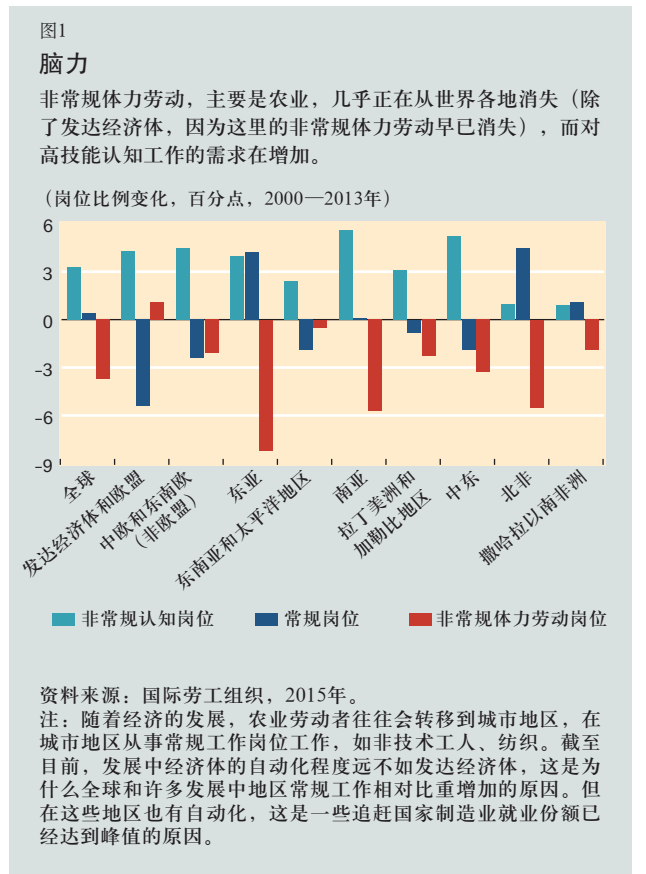
但是更多人，特别是那些曾经完成这些常规工作的人，不得不竞争类似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机会越

来越少，或者是不得不从事低技能工作，这常常伴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降低。平均来说，这些趋势不排除未来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会提高，但截至目前，这些收益的分配似乎已经“掏空”中产阶级，增加了高技能工作和低技能工作的工作机会。

变化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

这些技术变革引发的岗位就业转变似乎主要影响发达经济体（见图1）。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随着人们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制造业或小规模服务业工作，从低技能岗位到中高技能岗位这一传统转变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促使过去20年贫困率和弱势就业大幅度下降，也使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更富强的发展中经济体有可能通过大幅度提高消费力，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贡献（ILO，2013年）。但即使在这些经济体中，也可以看到让劳动者脱离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技术变革的早期影响。

如图1所示，在一些中等收入地区，中产阶级工作岗位不再显著增加，尽管这些工作岗位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这使得一些观察者对过早限制工业化表示担忧：这些经济体正在追赶发达经





济体，其全球技术动态可能会使中等收入地区比发达经济体更早面临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压力，可能会大幅阻碍这些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Rodrik，2013年）。

尽管这看上去有违直觉，但在如今这样高失业率的环境下，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来自另一个长期趋势：劳动力增长率逐渐下降。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的数量已经开始萎缩，这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但也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目前，全球青年劳动力正以每年400万人左右的速度减少。而且，在许多生活水平持续增长的国家，壮年劳动力（25—54岁）的工作（正在工作中或是在求职中）积极性也不如以前。这部分反映了收入的增加——努力摆脱极端贫困和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的劳动参与率通常很高，因为所有家庭成员不得不寻求就业机会，而条件改善后劳动参与率往往会下降。

此外，由于中产阶级在生活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中得到了发展，人们倾向于延长上学时间，从而提高了平均技能水平。原则上，这应该有助于抵消劳动力萎缩对经济增长的部分不利影响。然而，预计全球劳动力增长将更为缓慢——21世纪20年代的年增长不到1%，而20世纪90年代的年增长率为1.7%。劳动力增长放缓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下降0.4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长放缓在发达经济体将尤为严重，平均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熟练程度更高。

全球危机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平等和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后果也在持续拖累经济增长。投资率仍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此外，企业对有关政府为解决危机后果而实施的具体政策仍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给企业未来产品服务需求来源带来了不安全感。这抑制了投资率和创造就业率（见图2）。国际劳工组织的估算表明，一些国家的当前失业率与危机前的差别高达30%，这是企业部门高度不确定性的产物。继2008年9月华尔街投资公司雷曼兄弟破产后，投资缺乏活力显著抬高了失业率的总趋势，一些国家甚至上升了4至5个百分点（ILO，2014年）。

不仅如此，就业前景疲软已经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离职率放缓——即离开原单位，在其他单位就业的员工人数。这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为这些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来自新设备以及企业内外部的劳

动力重组等形式。有趣的是，劳动力市场离职率（也称为跳槽率）在生产率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危机后出现的其他因素。但随着劳动力市场整体跳槽率下降，生产率增长也在放缓（ILO，2015年）。

失业率高、产出增长缓慢以及生产率收益分配不均共同进一步腐蚀劳动者占全球经济的收入份额。只有在危机期间——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工资坚挺不跌——工薪阶层才能受益于收入增长，因为在此期间收入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然而，在随后的几年，工资再次落后于生产率增长，维持危机前几十年的趋势。尽管在当前环境下很难知道怎么才能改变这一趋势，实际上上述全球劳动力供给下降将有助于推动工资增长高于生产率增长——一些国家很快就会出现这一现象。

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后果也在持续拖累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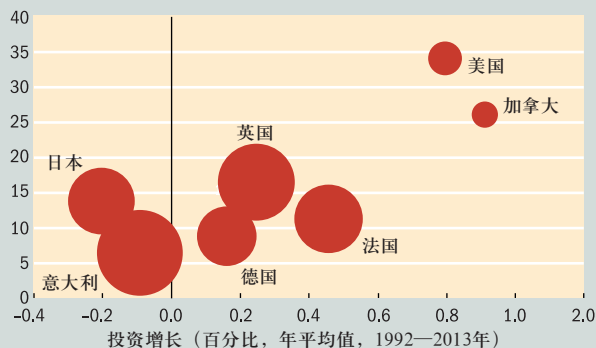
劳动力增长放缓将有助于当前求职者更容易找到新工作。特别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未来几年失业率有望大幅下降。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并不能完全体现在全球失业率上，因为向工业化经济转型的国家的失业率将会上升。但随着人们从农村工资低的非正规工作走向城市工资高的正规工作，这些失业率上升往往伴随着工作质量提高和工作环境改善。

图2

确定性是王牌

不确定性较低的时候，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一般较高，而且工作岗位增加更快。

（就业创造率，百分比，年平均值，1992—2013年）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数据库；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Ernst和Viegelahn（即将发布）。

注：该图显示了七国集团发达经济体实际固定资本总值形成增长率与就业创造率之间的长期关系。圆圈的大小表示长期的平均招聘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计算方法为招聘意向和实际招聘之差。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应该会消除一些保持工资低增长的压力。

工资增长更快

继增长和投资总体缓慢扩张之后，失业率趋势上升已经提高了失业率，此时劳动力市场复苏后工资增速往往会加快。长期复苏将导致工资增长更快，即使失业率仍然高于危机前水平。在数据充足的国家，这一影响很明显，事实上失业时间长达12个月及以上的人并没有导致工资面临大幅度下降的压力。

长期失业者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即使他们愿意接受低工资，也未必能很快找到工作。企业不愿意雇用长期无业的求职者，因为担心这些求职者缺乏技能和积极性。因此，长期失业者在影响工资动态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危机期间增加的正是这个群体的规模以及平均失业期，因此，工资只受相对较小的短期失业群体的波动影响（Gordon，2013年）。

对高技能岗位的劳动力需求转变也将对工资产生影响。随着全球人才争夺战的继续，具有适当技能的人员不仅会获得大量工作机会，而且也能够从他们创造的生产率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一些观察者估计，德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人才的需求在2015年就会供不应求。这个需求会产生更多压力，促使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合理安排利润分享以及提高基本工资来吸引最优秀的员工（Conference Board，2014年）。这将意味着整体工资增长更快，但也许这只是对于少数幸运者而言，而不是普通工薪阶级。

收益很少

劳动者收入份额和收入不平等动态将越来越分化。考虑到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见表），工资增长速度至少在中期范围内将超过生产率增长，但大部分收入增加仅限于小部分高技能劳动者，不超过全球劳动力的20%。因此，与过去30年的趋势记录相比，工作者收入不平等和劳动者收入份额——即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将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使政策制定者的工作进一步复杂化。

不仅生产率收益分配只使拥有适当技能的劳动者受益，而且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率仍将面临压力，特别是由于全球劳动力供给将会减速。事实上，工资增长可能加速将减少用于未来投资的利润，进一步抑制企业扩大产能的需求和意愿。这意味着当前潜在增长速度缓慢在中期内可能会继续，这将损害新兴市场经济体，阻止它们赶超发达经济体，也阻止它们进一步减少贫困。这一切表明一个潜在的劳动者天堂即将来

经济增长成果

虽然生产率增长速度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均高于工资增长水平，但是预计这一局面将很快发生改变。

	2000-2007年	2008-2009年	2010-2013年	2014-2016年	2017-2019年
工资增长	2.3	1.7	2.0	2.2	3.0
生产率增长	2.5	-0.6	2.6	2.4	2.9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

注：数据基于107个国家的样本。2014年及以后的数据为预测数据。

临，失业率降低，工作条件更好，工资也会更高。但是，能够进入这个天堂的只有那些拥有适当技能的劳动者——代价是全球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及减贫进展缓慢。■

埃克哈德·恩斯特（Ekkehard Ernst）是国际劳工组织有利就业宏观经济政策小组组长。

参考文献：

Autor, David H., 2014, "Polanyi's Paradox and the Shape of Employment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August 22.

The Conference Board, 2014, *From Not Enough Jobs to Not Enough Workers: What Retiring Baby Boomers and the Coming Labor Shortage Mean for Your Company* (New York).

Ernst, Ekkehard, and Christian Viegelahn, forthcoming, "Hiring Uncertainty: A New Labour Market Indicato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ordon, Robert J., 2013, "The Phillips Curve Is Alive and Well: Inflation and the NAIRU during the Slow Recover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39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3,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3* (Geneva).

——, 2014,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The Risk of a Jobless Recovery* (Geneva).

——, 2015,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5* (Geneva).

Jaumotte, Florence, and Irina Tytell, 2007, "How Has the Globalization of Labor Affecte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Advance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07/29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ic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2013, "The Perils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Syndicate, October 11.

重返工作岗位

全球失业率已经出现下降，但就业增长仍然疲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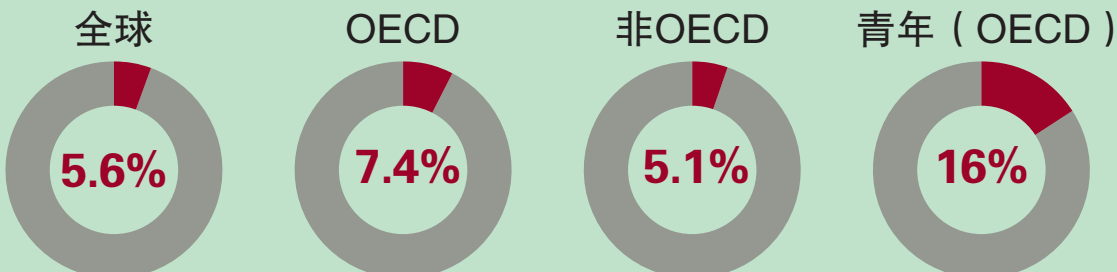
全球失业情况在大衰退结束后的五年已经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全球失业率在 2014 年降至 5.6%，与 2007 年（开始出现衰退的前一年）的情况基本一样。在过去五年里，很多大国的失业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包括美国和德国。

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然很高——例如，希腊、西班牙和南非的失业率达到 24%，甚至更高。一项新的就业指标“全球就业指数”显示，工作岗位的创造依然疲软——该指数的年比率为 1.5%，而危机前的比率高于 2%。

工作岗位的创造和经济增长如影随形，因此有必要通过支持性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调整来提升经济增长，以增加就业率，这样失业者和新加入劳动力大军队伍的人才有机会。



2014年的失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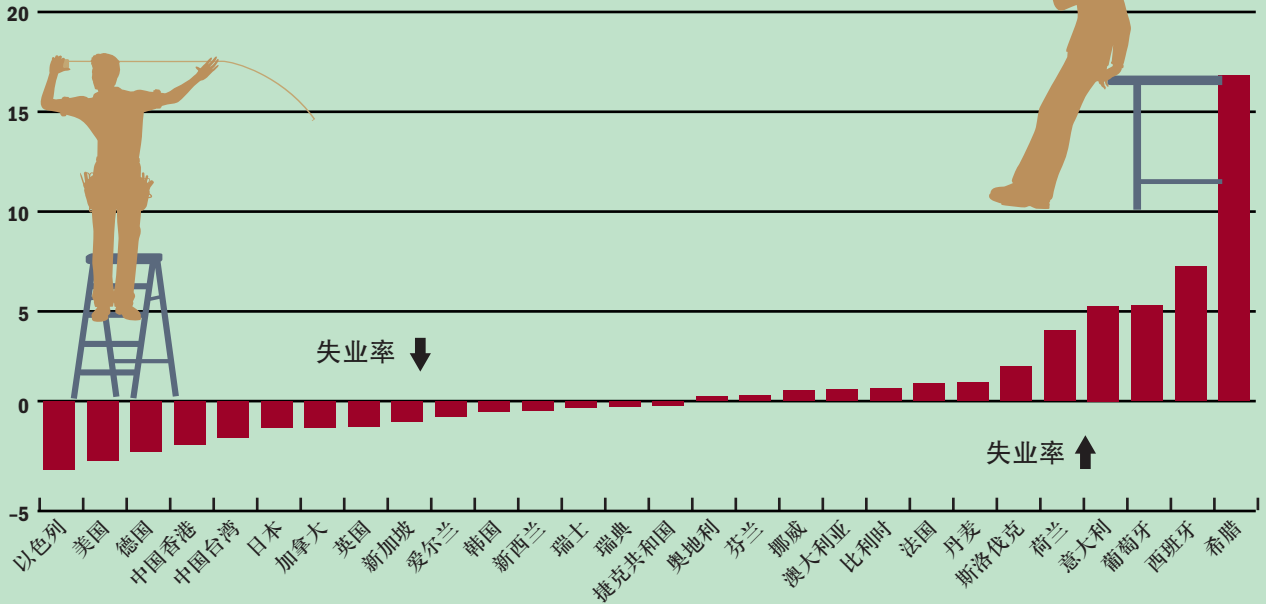
2014年失业率最高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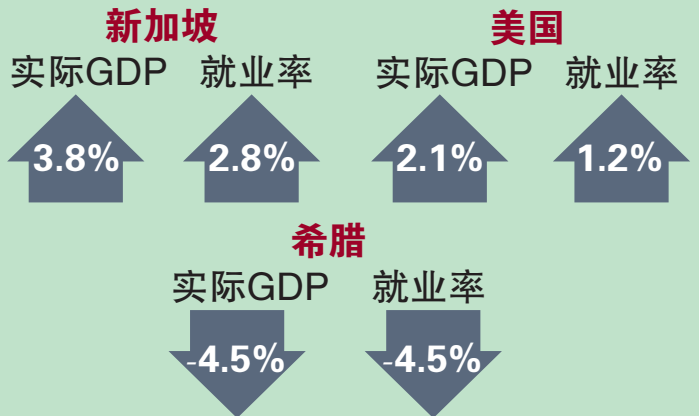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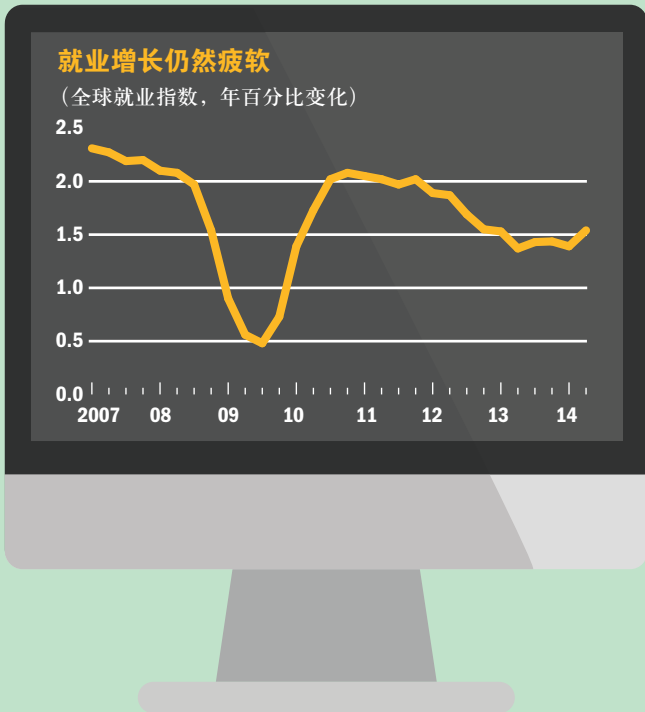
失业率在很多国家出现下降，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则出现上升。

(失业率，2009—2014年的百分比变化)



工作岗位的创造和经济增加如影随形

(2011—2014年的增长)



本文由经济学人智库 (EIU) 的里奥·阿布鲁泽斯 (Leo Abruzzese) 撰写。文字内容和图表基于由 IMF、EIU 和 OCP 政策中心于 2015 年 1 月发布的《国际就业报告》。该报告登于 <http://graphics.eiu.com/upload/eb/IJR-January-2015.pdf>。

欧洲失业问题



要解决欧元区的失业问题，
需要实现经济增长并提高劳
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富裕,都无法承受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大量失业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才是我们最沉重的负担,它是对我们社会秩序的最严重的精神威胁。”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934年9月30日

安嘎纳·巴纳吉

截至2014年6月底,欧元区共有1800万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这个数字超过荷兰的人口总数。其中,300万失业者介于15—24岁之间。但是,这一绝对数字并不能体现年轻人失业的总体情况(见图1)。

通过劳动力来衡量失业人口的数量揭示了一个可怕的局面。欧元区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由于该地区人口正快速老龄化,青年失业率一直高于成年人失业率,这意味着15—24岁的工作人口少于成年工作人口(25岁以上)。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青年失业率的增速一直高于成年人失业率,虽然各国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截至2014年6月底,10个年轻工作者中就有2个失业,而10个成年工作者中仅有1个失业。

年轻人、老年人和焦躁不安者

美国总统杜鲁门有句名言,“邻居失业意味着经济不景气;自己失业则意味着经济萧条。”一些评论家指出了成年人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之间的差异,并就是否需要专注于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进行了思考。

所有工作者都通过提供关键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体的增长能力作出了贡献。因此,所有失业都值得关注。

随着劳动者失业时间的延长,其生产能力就会下降,因为他们的技能会

逐步过时。这限制了经济体摆脱衰退的能力；由于劳动力的生产力下降，衰退的时间就会延长。因此，现在欧元区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失业已经至少一年，加入了所谓的长期失业者之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堪忧。2014年6月，长期失业者在所有失业者中的占比达到53%，在年轻失业者中，这一比例为40%。

虽然失业对所有劳动者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青年失业率高企尤其值得关注。

早期的失业经历将在工作者的心里留下“创伤”（见“受伤的一代”，《金融与发展》2012年3月号），使其找到体面工作的机会更为渺茫。很多研究人员找到了这种“创伤”的确实证据。这些影响甚至可以持续十多年，影响几代工作者。

此外，我们只要透过新闻标题就能了解青年失业率高企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使迫切需要开展的艰难改革更难以取得进展。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关系。另外一些研究也显示，成长阶段的失业经历会降低一个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信心，导致犯罪率升高。

也许对在职成年工作者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年轻群体失业率高企造成社会安全网的可持续性降低。由于人口不断老龄化，抚养比率（供养退休人士所需的劳动者数量）近年来逐步上升。随着退休工作者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供养负担正由越来越少的年轻工作者承担。青年失业率的持续高企加大了这些顾虑。

的确，抚养比率的不断上升可以通过引入移民工作者补充劳动力加以缓解。但是，通过移民解决这一问题在实际中却存在诸多限制（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任重而道远”）。而且现实已与往日大不相同，由于金融危机，很多移民已从欧元区的弱势国家流出。此外，一些迹象显示，高技能年轻工作者是选择离开

的群体，他们选择到国外学习、工作。

因此，解决欧元区青年失业的问题对整个社会都有利。

常见的解决方案

令人欣慰的是，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不应以忽视成年人失业为代价。IMF近期公布了一项研究（Banerji等人，2014年），该研究审视了欧洲22个发达经济体造成不同群体失业的原因。该研究发现，年轻人和成年人失业的原因非常相似：很大程度上由相同的因素造成，因此可以通过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解决。

青年失业率对产出增长的反应远强于成年人失业率。

但是乔治·奥威尔可能会说：一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平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欧洲造成失业的最重要因素是产出增长。自经济危机以来，平均有50%的年轻人失业增长和60%的成年人失业增长是由经济活动的变化所致。增长对各国的重要性并不相同；一个极端例子是西班牙，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活动的波动对青年失业率增长的影响似乎达到了90%。

这些数字很可能是保守估计。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往往都有着对其各自而言十分重要的特性，因此难以对所有国家采用一致的方式进行归纳或衡量。经济的很多方面也会影响政策和经济产出变化对就业市场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和影响速度。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根据之前应对劳动力短缺的经验，德国企业选择保留员工。因此，这些企业缩短了德国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间，而非裁退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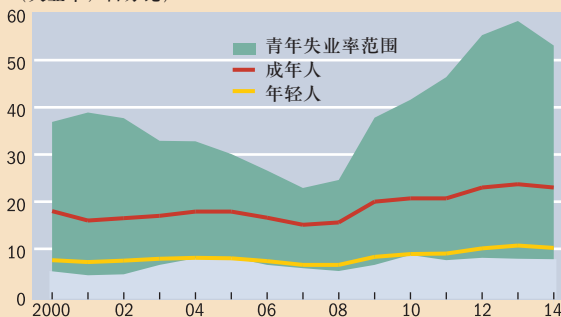
很明显，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对所有国家的工作者都有利。但是，各国在经济成果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失业率这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异（见图2）。最脆弱的欧元区国家将对此产生最强烈的反应——例如，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对于德国这样失业率较低的国家，这种反应要小得多。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在所有国家中青年失业率对产出增长的反应远强于成年人失业率——平均高三倍左右。

增长对年轻人失业影响较大的原因是年轻工作者的就业环境通常比成年工作者的更加脆弱。在欧元区，年轻工作者获得临时工合同的可能性是成年工作者的三倍。而且他们还是在更易受到经济衰退威胁的经济部门就职。例如，在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1/4的年轻工作者在楼市泡沫破裂之前在

图1
令人堪忧的形势

在欧洲，青年失业率约为成年人失业率的两倍左右，其中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接近50%。

（失业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IMF员工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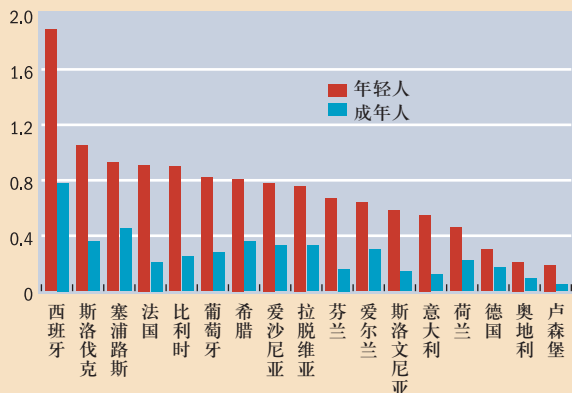
注：阴影显示了欧元区国家青年失业率的范围。

图2

就业增长

平均而言，增长下滑对年轻人失业的影响是其对成年工作者的三倍。

(增长每下滑一个百分点预计造成的失业率增长，百分点，1983—2012年)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IMF员工的计算。

建筑业工作。这些就业环境意味着年轻工作者在经济衰退时将会率先被裁退。

更为灵活的市场

IMF 的研究也显示，不灵活的就业市场可以导致更多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失业，其中一些特点——例如，工作合同提供的就业保护——与年轻工作者密切相关。因此，就业市场改革有助于降低失业率。

就这些有益的改革而言，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劳动者征税。较小的税收楔子（雇主的劳动力成本与其净收入之间的差异）可以降低雇佣成本，增加对于劳动者的需求，并使所有年龄段的失业者受益。

年轻工作者面临着额外的制约。相比成年人，他们更容易获得最低工资，因为他们的技能通常较低。由于金融危机期间欧元区很多经济体的工资逐步下调，因此必须确保最低工资相对于经济体内的平均工资而言不会显得过高，否则将可能导致聘请年轻工作者的成本相对于聘请成年工作者的成本显得过于昂贵。

降低工作的机会成本（例如，通过减少过于慷慨的失业福利）也可以降低成年人和年轻人的失业率。这是因为对处于失业的人来说，由于没有太多的财政激励措施，他们就有可能去寻找和接受他们本来不想要的工作。

另一个可以帮助人们重回工作岗位的改革是放宽工作合同的就业保护要求。这可以大幅降低青年和成年人失业率。但是，这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更大，因为在 15—24 岁之间的劳动者中存在着过高的临时合同发生率。临时和长期合同在就业保护方面的巨大差异

（即“劳动力市场二元性”）会带来让年轻工作者永远从事低级别工作的风险，从而导致雇主不愿意对其人力资本进行必要的投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将临时就业合同与行业领导的技能培养工作相结合。改善职业培训体系对年轻工作者尤为有益。在脆弱的欧元区国家中，只有 1/4 签订临时工作合同的年轻工作者能够参与职业培训或学徒计划，而在奥地利和德国等国家，此类培训属于标准计划。欧洲的几个国家已经使用了这类职业培训体系，十分有效地限制了劳动者会受到的“创伤”并为劳动者做好就业准备。

对年轻工作者实施积极的就业市场政策会很有帮助。这些计划对市场的干预可以降低失业率，但是目前大多数此类计划并不针对年轻工作者。计划应根据各国的制度、经济和社会背景量身打造，因为事实证明没有适合所有国家的万能药。除非得以很好地设计和有效地实施，否则这些计划将无法获得成功。IMF 的研究建议，要进一步关注旨在培养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在职培训。

充分就业尚需时日

目前，造成欧元区失业率高企的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以及危机前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如果政策专注于解决疲软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所有工作者都将收益。

政策制定者的首要工作是出台一系列支持性的货币政策，让在预算方面有足够余量的国家增加公共投资，以及采取措施帮助银行恢复借贷，以此重新激活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强劲的增长，失业情况就无法大幅改善。此外，推进能让企业更轻松聘请员工的关键改革、确保所有工作者都能获得一个公平的环境、让工作者能够在转换工作的期间保持和改善其工作技能同样也非常重要。■

安嘎纳·巴纳吉 (Angana Banerji) 是 IMF 欧洲部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最近发布的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4/11 “Youth Unemployment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 Europe: Searching for Solutions” (Angana Banerji、Sergejs Saksonovs、Huidan Lin 和 Rodolphe Blavy 撰写)。

人民的力量

弗劳伦斯·雅莫特、卡罗莱纳·奥索里奥·布依特隆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中的不平等现象一直在加剧，其原因主要在于收入主要集中在处于分配顶层的人群手中。尽管衡量不平等的方法大量增加，但最惊人的发展还是收入最高的 10% 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且增幅很大——较传统的衡量方法基尼系数仅能体现其中的一部分增长（见图 1）。

基尼系数是一种汇总统计法，用于测量收入分配中任意两个个体间的平均收入差异。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全部收入的平等分配，那么基尼系数值为 0，如果全部收入归一人所有，则其值为 100（或 1）。

通过加强对工作和投资的激励机制，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于提高效率，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中

期增长水平则越低、增长也越不可持续（Berg 和 Ostry，2011 年；Berg、Ostry 和 Zettelmeyer，2012 年），即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情况也是如此（OECD，2014 年）。再者，如果处于分配顶层的群体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经济和政治制度，越来越多的收入会汇集到这些人手中，人口福利就会受到损害（Stiglitz，2012 年）。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归因于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与全球化，两者增加了对技术工作者的相对需求，这让高收入人群获得了比中等收入人群更多的收益。但是，技术和全球化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政策制定者几乎无力也不愿扭转这种趋势。此外，虽然各高收入国家均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中受到了相似影响，但在

最近几十年来 工会组织的衰退促进了收入 分配顶层人群 收入的增长

在英国伯恩茅斯年度英国工会联盟会议上投票。



这些国家中，不平等现象的增速和程度各不相同。

因此，近期的经济研究侧重于制度变革的影响，金融自由化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下降通常被视为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如降低工会成员的比例和减少最低工资与中位工资之间的比率——并未成为近期争论的重点。在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分析 20 个发达经济体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今的经验，我们审视了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并重点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各界普遍认为工会或最低工资的变化会给中低收入工作者造成不利影响，但不太可能给高收入群体带来直接影响。

工会的衰退削弱了工作者向资本所有者议价的能力。

尽管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之前有关最低工资影响的观点一致，但是我们发现有明显迹象表明 1980—2010 年发达经济体中工会组织的衰退与顶层群体收入份额的增长有关（如，见图 2），这对有关工会密度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预见提出了挑战。这一点是我们在分析中找到的最新颖的现象，它为对工会衰退与顶层群体中间不平等现象加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分配顶层的变化

经济研究突出强调了工会和最低工资影响中低层群体收入分配的多种途径，如工资离差、失业率和再分配。但我们的研究还考虑了工会力量越薄弱则顶层群体的收入占比越高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并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作出了假设。

因此，劳动力市场制度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途径包括：

工资离差：一般观点认为，工会与最低工资能够通过促进工资分配的平等化减少不平等，经济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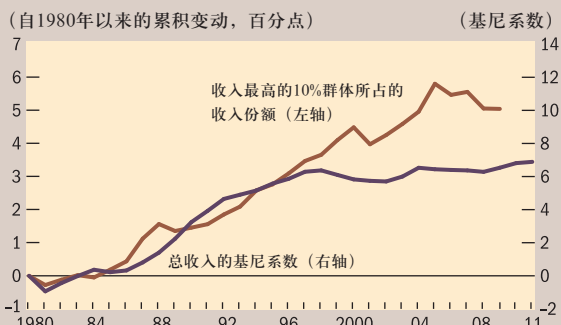
失业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工会力量的增强和最低工资的提高能够减少工资的不平等，但同时也可能将工资保持在“市场清算价格”水平以上，进而提高失业率，导致总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但这一假设的实证支持并不充分，至少在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安排范围内是如此（参见 Betcherman, 2012 年；Baker 等人, 2004 年；Freeman, 2000 年；Howell 等人, 2007 年；OECD, 2006 年）。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17 项研究回顾显示，其中仅 3 项研究认为工会密度（或谈判覆盖率）和总失业率上升之间存在紧密关联。

再分配：强大的工会可通过动员工作者或领导所有政治党派来为承诺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党派投票，促使政策制定者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从历史上看，工会在基本社会权利与劳动权利的推广方面发挥着重

图1

顶层群体将占据更大的收入份额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经济体中位于收入分配顶层的群体将占有更多的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不平等。



资料来源：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4.0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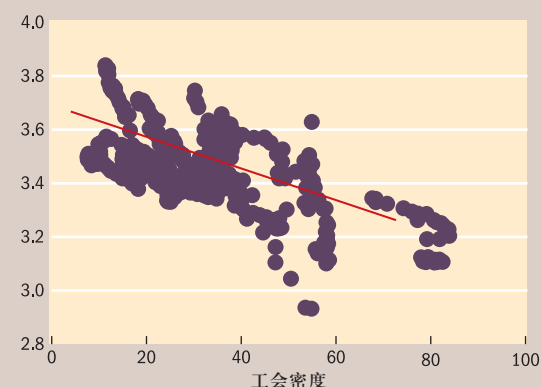
注：如果一个国家实现了全部收入的平等分配，那么基尼系数为0，如果全部收入归一人所有，则为100。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简单平均数。因数据不足，针对收入最高的10%群体进行的收入份额统计不包含下列国家：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新西兰、葡萄牙、英国。

图2

分配公平

在发达经济体中，工会的削弱与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份额的增长息息相关。

(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总收入份额的对数，1980—2010年)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4.0版）。

注：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美国。工会密度是指隶属于工会的工作者的份额。

要的作用。相反，工会的削弱会导致再分配的减少和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即税后收入不平等与转账后收入不平等）。

工作者的谈判能力和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工会密度降低会削弱工作者的议价能力，进而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自然受到较低层级群体的收入变化所影响。如果工会的瓦解会降低中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则其一定会提高企业管理人员薪酬与股东回报在收入中的占比。从直觉来讲，工会的衰退削弱了工作者向资本所有者议价的能力，从而提高了资本收入的份额——与工资和薪酬相比，资本收入更多地集中在分配顶层的群体手中。此外，在企业作出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决策（如高管人员的薪酬规模和结构）时，工会力量的削弱会降低普通工作者对这种决策的影响力。

工会组织的衰退与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的增长密切相关。

为研究在不平等加剧的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最低工资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使用了经济计量技术对样本数据进行研究，该样本包含所有可提供1980—2010年数据的发达经济体。我们审视了多种衡量不平等现象的手段（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净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劳动力市场制度及多个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学家发现的造成不平等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如技术、全球化（来自低成本外籍工作者的竞争）、金融自由化、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以及这些变量中的全球普遍趋势的控制变量。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工会组织的衰退与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的增长密切相关。

虽然难以建立因果关系，但工会的衰退似乎就是促进顶层群体收入份额增长的关键因素。即便将政治权力的转移、与不平等相关的社会规范的变化、部门就业转型（如去工业化、财政部门的作用日益增强）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考虑在内，这一结果仍然是正确的。工会的密度与总收入基尼系数之间仍为负相关的关系，但略有弱化。原因可能是基尼系数低估了收入分配顶层群体之间不平等情况的加剧。

我们还发现工会的瓦解与收入再分配较薄弱有关，而且，最低工资的降低大大加剧了总体的不平等状况。

就收入最高的10%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而言，在其5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平均约有一半是由于工会衰退所致。同样，净收入基尼系数的增长中有50%左右是工会的瓦解所致。

未来的研究重点

我们的研究以工会组织为重点，将其作为工作者谈判能力的衡量手段。除了这个简单的手段之外，我们还有必要深入研究，查明有关工会的最成功的方面（如集体谈判、仲裁）以及有些方面是否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更具破坏性。

工会衰退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剧对社会来说是好是坏，目前尚不明确。虽然顶层收入群体收入份额的增长能够反映出其生产力的相对增长（良性的不平等），但顶层收入群体的薪酬可能高于他们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反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抽租”（恶性的不平等）。不平等还会通过顶层收入群体对经济和政策制度的操纵给社会造成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政策行动。具体行动可以包括企业治理改革，以便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工作者、管理者和股东提供高管工资决策表决权；改进与绩效相关的工资合同的设计，特别是偏好风险的金融部门的合同；重新肯定那些允许有意愿的工作者参与集体谈判的劳动标准。■

弗劳伦斯·雅莫特（Florence Jaumotte）是IMF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卡罗莱纳·奥索里奥·布依特隆（Carolina Osorio Buitron）是该部门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作者撰写的一篇即将发表的IMF论文。

参考文献：

- Baker, Dean, Andrew Glyn, David R. Howell, and John Schmitt, 2004,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Unemployment: Assessment of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in *Fighting Unemployment: The Limits of Free Market Orthodoxy*, edited by David R. Howell, pp. 72–118.
- Berg, Andrew, and Jonathan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Berg, Andrew, Jonathan Ostry, and Jeromin Zettelmeyer, 2012, "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8, No. 2, pp. 149–66.
- Betcherman, Gordon, 2012,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 6276* (Washington).
- Freeman, Richard B., 2000, "Single Peaked Vs. Diversified Capitalism: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Outcom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755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Howell, David R., Dean Baker, Andrew Glyn, and John Schmitt, 2007, "Are Protective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t the Root of Unemploy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apitalism and Society*, Vol. 2, No. 1.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6,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 , 2014, "Focus 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December 9.
- Stiglitz, Joseph,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首要任务

以工资和公共投资带动复苏的时刻已经来临

夏朗·巴洛



夏朗·巴洛 (Sharan Burrow) 是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

六年多前，全球爆发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今天全球就业赤字依然赤裸裸地反映出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经济政策的错误。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4 年全球失业率为 5.9%，超过 2 亿人失业，远高于 2007 年金融危机前的 5.5%。

这些数据并未囊括数以亿计的未充分就业、非正规就业或收入很低以至于自己及家人仍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工作者。ILO 表示，约 7.6 亿工作者属于“工作贫穷”（每日收入不足 2 美元），占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口的 28%。

ILO 的失业数据也不包括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所谓的“怯志工人”）。这解释了为何 2014 年的劳动力参与率甚至低于 2009 年经济衰退最严重时期的水平。鉴于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ILO 预测 2014 年全球就业与人口比率为 59.7%，与 2009 年持平，但远低于 2007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 60.7%。

政策缺陷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前两年里，国际社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成功阻止了金融业的崩盘，制止了全球经济活动出现螺旋式下降，并帮助全球劳动力重回工作岗位。但在实现前两个目标之后，随着金融业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盈利水平也重回至危机前水平，第三个目标遭到抛弃。

2010 年，全球停止了对金融业的纾困，也不再实施旨在终结经济衰退的刺激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不成熟且往往得不偿失的削减赤字举措。这些举措通常包括削减社会计划和其他公共支出、增加递减税。

这些政策不仅恶化了最依赖国家支持的行业的条件，同时也打断了很多国家的脆弱复苏——尤其是欧元区，到 2012 年它已陷入二次衰退。宣称旨在减少公共债务的紧缩政策也证明是一次彻底失败，因为不断有国家陷入新的衰退，进而导致债务在其 GDP 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滞后的工资水平

金融危机后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工资增长滞后于生产力增长，进而导致总需求下滑。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和世界银行 (ILO、OECD、世界银行；2014 年) 于 2014 年 9 月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了这一现象，并就其如何抑制强劲复苏并加剧不平等进行了说明。

“在多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工资增速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力增速。过去数十年间，多数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劳动者收入占比不断下滑，而另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占比则处于停滞水平。在许多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工资和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重新激活经济增长……依赖于需求复苏，而需求复苏则要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工资。”



国际工会联盟 (ITUC) 对 14 个国家进行了调研，其结果显示仅半数受访者认为下一代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8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低于生活成本或处于停滞水平，并且半数双职工家庭认为他们无法跟上生活成本上涨的步伐。78%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体系对富人更有利，但对多数人并不公平。

全球复苏战略

全球工会运动旨在应对长期经济停滞以及需求不足导致的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该运动提出要制定一份全球复苏战略，这份战略依赖于恢复公共社会和实体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工资增长和投资。

ITUC 在一项模拟操作中发现，涵盖工资协调增长与公共投资刺激的政策组合可以使二十国集团成员国未来五年内的经济增速提高 5.8% (ITUC, 2014 年)。由工资和投资带动的复苏战略也能帮助各国实现社会、环境和财政可持续性以及降低不平等性的目标。

虽然 IMF 和其他国际组织日益关注不平等问题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多数机构尚未针对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所有原因——尤其是针对劳动力市场机构和政策的发展——制定出一致且连贯的应对举措。

除了压低总需求的财政紧缩措施，降低就业保障和下调最低标准的政策会降低劳动者的收入并导致总体收入分配失衡。

ILO 在《2014/2015 年全球工资报告》中指出：“不平等始于劳动力市场”。在不平等情况恶化最严重的经济体中，这一现象通常可以从因失业率增加和工资不平等性加剧而造成的收入降低中窥见一斑。然而，该报告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趋势与全球趋势相反，其不平等现象有所下降，“更加平等的工资分配和有偿就业是主要因素”。

这突显了有关最低生活工资、防范不公裁退和稳健的集体谈判机构等政策的重要性。一些国际机构毫无根据地假定监管水平与就业之间存在一种牢固且系统的负相关关系，从而鼓吹减少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劳动力市场机构。

世界银行将其旗舰报告《2013 年全球发展报告》的主题定为就业，对近期关于就业保护立法和最低工资的经济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回顾。该报告发现“多数有关 [劳动力市场监管] 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的估算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或较为温和”。该报告也指出，“很明显，工会和集体谈判影响着收入差异的均衡”。

旨在放宽劳动力市场监管和削弱集体谈判的政策一直是 IMF 所支持的调整计划——尤其是南欧和东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计划——的重要特征。一

些国家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其集体谈判的覆盖范围也显著下降。

谁都无法接受又一个六年的全球就业停滞以及一些国家的经济衰退。

其直接影响是国内需求大幅下滑，从而使财政紧缩政策对衰退的冲击加大并导致一些国家失业率上升 25% 以上。这些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而且未来这种情况会变得更糟。有组织的劳动者一直是赞成全面社会保障和累进税制的选民——削弱其作用不仅会对工资水平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意义更深远的再分配政策。

现在是让全球议程重回正轨的时刻，让创造工作机会成为各方的首要任务。谁都无法接受又一个六年的全球就业停滞以及一些国家的经济衰退。

ITUC 全球调研的结果显示，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希望其政府能够更加活跃。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削弱企业权力 (62%)、应对气候变化 (73%)。

全球劳动力运动明确了势在必行的几项任务：提高工资、增强社会保护、削弱企业权力、消除工资奴隶、实现气候正义和良好的经济治理，并通过不断创造工作机会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4,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World Bank (ILO, OECD, World Bank), 2014, “G20 Labour Markets: Outlook, Key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G20 Labour and Employment Ministerial Meeting, Melbourne, September 11.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2014, “The Case for a Coordinated Policy Mix of Wage-Led Recovery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the G20,” economic modeling results prepared for the L20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rade unions from G20 countries.

年轻人的 共鸣

2012年年初,《金融与发展》采访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六位年轻人,他们身处不利的经济环境,正试图加入劳动力大军。

我们又重新采访了他们之中的四位,分别来自波斯尼亚、埃及、日本和美国。我们未能与秘鲁的阿迪莫尔·加西亚联系上,他已经从秘鲁北部的山区搬到了位于首都利马郊区的一个贫民区,谋求就业机会并接受一些教育。他失去了玻璃切割作坊的工作,并在2012年开始寻找半日制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留出上午或下午的时间去上课。我们也没能联系到生活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切尔玛·尼瓦萨耶,她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寻找工作,同时她已经决定读研。

以下是我们所采访过的四位年轻人生活中的最新进展。

在波斯尼亚找到一份理想工作

阿玛·波拉希克-休曼,2009年毕业于萨拉热窝大学法学院。她在2013年3月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但在此之前她用了4年的时间求职,投出了385份求职申请。

28岁的波拉希克-休曼对于在萨拉热窝市法院找到的这份工作非常开心,她说据她所知,还有许多年轻人一直处于失业状态。波黑的失业率高达45%,居欧洲之首。根据波斯尼亚劳动和就业局的数据,如果将非正式经济中的工作者计算在内,失业率则将降至27.5%。

她说,“当同事打电话告诉我,我被任命为萨拉热窝市法院的专业助理时,我觉得这是在跟我开玩笑”。波拉希克-休曼在找到这份工作的一年前通过了司法考试,

但当时没有任何工作机会。

“在那段时期,我不断地投递求职信,做完了法学院毕业后求职所需要的一切准备工作——我通过了司法考试,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当时真是感到绝望,并陷入抑郁之中,”她说。

波拉希克-休曼在网络上或各家公司网站上找到大部分招聘广告,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投递求职信,这占到她投出的求职信的90%。可是其中大部分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她觉得自己的求职之路之所以如此漫长是因为她不是出身于一个有权势背景的家庭,也没有任何政界的关系。她为自己纯粹凭借自身的素质和技能被选中而感到自豪。“在进行求职面试的过程中,面试官根据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询问我对某些法律对策的观点,这重新唤起了我对法律制度的信心,”她说,“他





们认可了我的抱负以及我对获取必要知识所付出的努力，对这一点我感到开心极了。”

她所供职的部门是处理法院判令的执行，主要是针对萨拉热窝市政公司未偿付账单的催收。由于预算紧张，她是办公室中唯一一名专业助理。“我工作非常辛苦，但我从不抱怨。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感觉个人价值得到完美实现，我非常高兴。”

她认为，多年的求职之路帮助她培养了耐心和谅解的能力，当她面对不能支付账单的各种当事人时，这一点对她有所助益。“由于我能了解在我们的当今社会中，存在着社会不公和贫穷的现状，我能够妥善地处理每一桩案件，或许也能够以更好的方式来介绍案件，”她说。

“我和不同职业的人都聊过，比如护士或者IT专家等，他们无法在其专业领域找到工作，这着实令人气馁。”

明年，波拉希克-休曼可以申请去做法官。她表示，希望自己的个人素质和勤奋工作能够得到遴选委员会的认可，不过，她也说如果第一次申请落选的话，她不会感到失望。

波拉希克-休曼在2014年12月结婚，现在小两口住在她最近购买的一套公寓中。她采用了20年按揭贷款的方式，每月还款额几乎用去她月工资的一半（1200波斯尼亚马克，相当于754美元）。不过，她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有着稳定的工作和国家发的正式工资，”她说。她预计一旦成为法官，她的收入还有上涨空间。

尽管波拉希克-休曼对在波黑的状况感到满意，她说她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希望走出去。“我和不同职业的人都聊过，比如护士或者IT专家等，他们无法在其专业领域找到工作，这着实令人气馁。即便他们对整个国家的运转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国家并未努力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她说。

波拉希克-休曼认为，劳动法是导致大批年轻人纷纷离去的主要原因。如果养老基金能够得到加强，年龄较大的工作者就可以退休，为年轻人留出空缺。

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坚持是唯一的出路；至少在这个国家是这样的。这里的人们注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想要的东西，用自己的实力、通过自己的方法来拼杀奋斗。以我本人为例，我得到了认可，我所能向大家给出的建议是，坚定决心，奋力争取自己的权利。” ■

撰稿：达莉亚·斯图-苏西科（Daria Sito-Sucic）；
摄影：达都·路维克（Dado Ruvic）

埃及纪录片获奥斯卡提名

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了为期18天的革命运动。然而，艾哈迈德·哈山从来没有想到他在革命中费尽心力所摄制的视频短片会如此这般地改变他的生活轨迹。哈山遇到了一位埃及裔美国电影制作人——耶海恩·诺杰姆，他们两个人都扛着摄像机记录下革命的每个瞬间。

他们将视频短片制作成为一部未经删节的纪录片，片名为《广场》，诺杰姆担任导演，哈山既负责摄影，又出演主要角色。该部纪录片讲述了埃及革命的经过——从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到2013年新选总统穆罕默德·莫尔西的继任。《广场》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提名。

尽管《广场》没有获得奥斯卡奖，但是其国际影响力（奈飞公司自2014年1月开始提供该片的在线电影）使这位中产阶级年轻人一夜成名，尽管埃及的当权者试图在本国内对其进行打压。

“审查机构没有批准该纪录片在影院上映，但是影片还是通过YouTube流传出来，而且盗版CD在路边就可以买到，”哈山说，“我们确实没有从这部影片挣到钱，但是片子家喻户晓，有些名气的咖啡馆还举办该片的放映专场——我会收到参加这些放映会的邀请，我简直无法描述我的喜悦之情。”

2014年8月，哈山以其为《广场》一片中所做出的工作获得了美国国际电视艺术和科学学院颁发的艾美奖，成为了首位获得该项大奖的埃及人。

不过，哈山并不太情愿成为明星和领袖。“在埃及革命之后，年轻一代试图鼓励我让我在媒体上为他们讲话，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并非是担任领袖的合适人选。除了我过去在埃及私营和政府媒体中担任一些职务之外，我更喜欢不抛头露面的方式。媒体中露面的每个人都会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而我更愿意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工作。我购置了摄影和剪辑设备，并开始培养我的专业技能。”

哈山说，他对其未来并未设定长期目标。“我喜欢活在当下，”他说。他目前是一位独立导演和摄影师，正在拍



摄和剪辑另外一部有关革命的纪录片。他的另外一部有关政治犯的电影也即将杀青。本片中的女性领袖人物是积极分子萨娜·阿普杜勒·法塔赫，也是他的密友之一，她因抗议被定罪，并于2014年年底被判三年监禁。

哈山表示，他对于埃及的民主变革没有失去信心，不过他说变革进程缓慢以及埃及总是重蹈政治失误的覆辙令人感到困扰。

他还表示想要留在埃及，不过他希望能在国外居住一小段时间。“我从未想过要移民。现在，我正在寻找在英国或美国任教一年或两年的机会，希望能有好运。我想，这会为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一个大的转变。”

哈山说，新技术和社交媒体在其职业生涯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速度对我而言很有帮助。我会对重大事件

以及冲突等进行拍摄，然后将其上传至 YouTube，视频会获得数万次的浏览量，这也是我获得成功和知名度的一大原因。”

他的艺术成就为他带来的经济回报也很丰厚。“我每月的收入已经增长了很多倍，我现在居住在城市（开罗）中心地带自己的房子里。”他将自己的老房子给母亲和姊妹居住，并为她们提供资助。

即便如此，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我的财务状况确实有所改善……不过，目前我还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也许还要再等几年吧。” ■

撰稿和摄影：希沙姆·阿拉姆 (Hisham Allam)

在日本，向前一步，退后两步

对于佐藤拓实来说，这几年 IT 行业就像一部过山车。上次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努力应对着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后来他失业了，现在他感觉自己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牺牲品。

佐藤的父母对他十分关心，一直劝说他在位于东京东部自己的家中多住些时间，但佐藤还是表现得非常独立，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东京北部郊区川越市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

26 岁的佐藤说，他决定依靠政府每月援助的大约 1,000 美元来度日。“我必须精打细算，不过我现在也习惯这样了每个月我都努力做到能剩余一点点作为储蓄，”他说。

佐藤的生活一度曾经出现转机。他与一家制作电视动画和视频节目的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合同，尽管合同没有续签，但他很快又在另外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半年的差事，这家公司是为超市和便利店准备便当午餐的。但之后由于佐藤先前曾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自闭症类群疾病）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鉴于他的心理健康出现恶化，医生建议他辞掉工作。恢复健康之后，佐藤加入了日本政府的就业服务中心——“你好工作”，他说他很高兴，因为他几乎马上就在一家生产智能手机和在线游戏的公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就像梦想成真一样，因为这正是我想找到的那类工作，”佐藤说，他毕业于技术专科学校，主修计算机游戏设计和制作。

不过，佐藤这次签订的合同还是六个月的可持续展合同，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者目前都面临这种局面，而之前他们所享受的是与本国公司签订终身工作的就业模式。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经济衰退之后，这一体系逐步式微。

“他们告诉我，我能够在完成前六个月工作之后获得全职员工的身份，”佐藤说，“这意味着在这六个月当中我无法获得正式员工的所享有的任何待遇，这六个月让人感



觉非常漫长。”

压力开始产生不良后果，佐藤出现睡眠问题，上班常常迟到。公司多次警告他需要按时出勤，但是这使情况变得更糟，佐藤说。佐藤的医生诊断他有睡眠障碍，后来公司跟他履行完毕六个月的合同，也支付了他工资，但没有与他续签。

他目前处于失业状态，并在进行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我真的想去工作，”他说，“我想找到一个能够全盘接纳我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目前正在向别人寻求帮助，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富有效率的员工。”生活中的所有其他方面，从交友到建立自己的家庭，都处于停滞状态。“我无法工作，那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位生活伴侣并为家庭提供保障呢？”

佐藤似乎对他的困境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只有在提到日本的政治形势时他变得活跃起来甚至有些气愤。“安倍经济学没有为我和上百万像我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他说，并提到了首相安倍晋三通过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和结构性改革来强化日本经济的种种努力。

佐藤说,安倍的政策扩大了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他在帮助那些已经拥有一切的人,”他说,“就是那些富人、大公司和老年人。而像我一样的年轻兼职员工、失业人员或者忍受病痛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和权利。”

2014年11月,安倍为下一个月召集了一次紧急议会选举。

佐藤说在12月份的选举中他将票投给了日本共产党。而安倍的自民党却轻松当选。■

撰稿:朱利安·赖亚尔(Julian Ryall);摄影:阿尔菲·古德里奇(Alfie Goodrich)

美国的另类人士

社会活动家亚历克莎·克莱感到有些失落和迷惘。部分原因是文化冲击她最近从柏林重返华盛顿做短暂停留,现在她把柏林称为家乡。她说,美国首都生活的疯狂节奏以及对工作的痴狂再次令她震惊。

她感觉迷惘的另外一个原因更多是关乎存在的。克莱花费了大部分时间思索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资本主义要走向何方?最后仅存的这个超级大国将何去何从?在统一的大超大型公司中如何推动富有意义的变革?

两年前当《金融与发展》采访克莱时,她就职于一个非政府机构,当时正忙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华尔街贪婪性的厌恶为运动推波助澜,而且当时看似这种运动会持续下去。但事实上,占领运动失去了动力并基本上淡出了公众视线之外。

两年之后,克莱承认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满怀希望。“事情实际上[要比我过去认为的]更加复杂。可以说,现在我做着同样的工作,工作也同样勤奋,但变革的发生确实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看到的那样迅速。”

占领运动之后,克莱将自己重塑为她所自称之为的“文化黑客”,并对自己的局外人身份陶醉不已。她的网站将



自己描绘成为“首席另类”,其秉承的目标是“重构资本主义精神,每次针对一个另类人士”。

“另类”这个概念可能比较清晰,但什么是“文化黑客”呢?“我的父母都是人类学家,所以文化对我来说一直都是相当重要的。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我们也可以主动去塑造文化。而“黑客行为”是指了解相关系统并进而对其进行改变。黑客知道如何对系统进行分解。他们了解系统的每个组成部分。这是很紧急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忠诚是为了某种更大的利益。”

作为她的文化黑客行为日程的一部分,克莱帮助成立了“内部创业者联盟”,该联盟为那些希望从内部实现业务转变的大型组织机构的员工(她本人将其称为“小屋勇士”)提供同侪支持。

她举了一个例子,第三代汽车行业员工戴维。戴维的目标是促使其供职的公司除其生产汽车的主要目标之外重新思考城市交通问题。

“对于像戴维这样的人,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一次时长为一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过程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他作为社会内部创业家的身份:他是大赦国际的成员,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将所有这些其他元素融入了其工作之中。许多其他人可能没有他这样的勇气在工作场所做到如此真实。”

“我们在与他谈过之后,进行了首次人员召集,我们召集了20位我们感觉符合这一描述的人。我们让他们彼此之间见面。之后,进行了一次全球性的竞赛来获得更多人员加入网络。”

克莱的工作需要进行许多谈话不过对于她来讲交谈、联络、讨论和交流思想本身就是目的之所在。克莱这位文化黑客在其网站上写道:“我将谈话作为了解全球状态的工具。我利用交谈来寻找关联,发挥作用。”

不过,一位女性无法仅依靠谈话生活,克莱在过去两年中的游牧式生活方式是靠公共演讲、咨询和写作等活动来提供资金来源的。

基于她对社会上另类人士的颂扬,克莱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书,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付梓出版,书名为《另类经济》(The Misfit Economy)。该书考察了在地下和非正式经济中的创新者,即书名中所说的“另类”人士。

克莱给出的另类人士示例包括那些令人讨厌的索马里海盗和毒贩以及嘎嘎小姐,她将这些称为将“另类情绪”进行利用的另类人士。这种描述对克莱和对嘎嘎小姐来说可能同样恰当。■

撰稿:康铉成(Hyun-Sung Khang);摄影:迈克尔·斯比罗特洛(Michael Spilotro)



挪威

设计、民主与胆识

设计新版纸币或硬币的原因有很多。可能为打击货币伪造，也可能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无疑这也是一个国家向它的人民和全世界展示全新面貌的机会。尽管一个国家的国旗和国歌不会改变，但它的货币可以作为一个窗口，让外界了解这个国家不断发生的演变。《金融与发展》将在这个新系列文章中，为您讲述世界各地一些国家货币背后的故事。

克里斯托夫·考克利

挪威新版纸币将于2017年发行，此版纸币尚未流通就已享有“全球最酷纸钞”的美名。其大胆的设计和评选程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怎样的挪威呢？

挪威在很多方面位居全球之首。从地理位置上看，挪威国土深入北极圈内，共有五百万人口，在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排名中高居榜首。

君主制和民主制

2012年12月，挪威银行启动了推出新版纸币的漫长过程，认为有必要更新纸币的防伪功能。2014年，挪威银行宣布通过比赛选出同时满足安全和审美需要的纸币设计。

挪威银行与来自各行各业的评审团成员共同完成了评选，他们独辟蹊径，评选出两个提案，将它们结合起来，用于纸币的生产。

纸币正面将采用米特里克设计工作室提交的“挪威生活空间”提案，背面采用斯诺海塔设计公司的“边界之美”提案。这两个提案的融合将把“空间”与“边界”和谐地统一起来。此外，公平、开放的竞争流程以及两家提案同时中标的结果也展示了挪威在民主与包容性方面的良好声誉。

挪威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同时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其货币的演变展现了本国社会关注焦点的变迁。首版纸币于19世纪末发行，图案均采用国王的肖像。近几十年的纸币出现了挪威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杰出公





挪威新版纸币的背面。

民，如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挪威银行为其最新版纸币设计的主题是“海洋”。

海洋的意义

长期以来，挪威独一无二的峡湾海岸线不仅仅是国家的一条边界，更发挥着口岸的作用，海洋是挪威发展经济和滋养文化的生命线。古老的维京人曾以探险为生，8 世纪末到 11 世纪晚期，他们依靠抢掠和贸易买卖纵横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而当今时代，挪威的“探险”表现为海上石油工业的开发。石油收益约占挪威国内生产总值的 1/4。这些收益是共享的。石油收入将注入挪威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当中，为全体国民服务。

这些元素均体现在新版纸币的设计当中，所选图案既回顾了历史，又展望了未来。纸币一面的图案清晰可辨，100 克朗纸币的图案为维京战舰，200 克朗采用了鱼形图案。纸币的另一面是明显的像素化图像，用设计师的话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在价值更高的纸币中，这些图像长度更长、更为抽象，这一效果旨在唤起人们对风的联想。纸币还探索了模糊边界的效果，每类纸币都从其下一序列的纸币中借用了一些颜色。

“我们选择了我们心目中既富有原创性又与挪威密切相关的主题，挪威国土不大，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沿海国家。挪威的总海岸线长达 8.3 万公里，是欧洲之最。海洋资源的使用以及海洋作为运输动脉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挪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挪威银行出纳部主管
特朗德·埃科隆德（Trond Eklund）

设计与创新

挪威的新版纸币因其大胆的形式美学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

但北欧地区的设计和创新动力始终牢牢植根于功能。如果说必要性是创新之母，那么古代北欧人用巧妙的方法抵御冬天的严寒与黑暗、到远离国土的大陆探险也只是生计使然，不足为奇。当时的维京人开创了发达的海上贸易、船战和航海业，并确立了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

挪威的新版纸币因其大胆的形式美学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

一千年前，死去的维京人与钱币一同埋葬在船里，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把钱币带到来世。但同时他们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机智、创新和冒险的性格让今天的挪威人受益匪浅。这些精神已经在挪威大胆、前卫的纸币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克里斯托夫·考克利（Christopher Coakley）是 IMF 信息交流部官员。

挪威新版纸币的正面。



预测效果：一片大好

胡琪昂、保罗·莫罗

经济学家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往往过于乐观

乐观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常常会把事情的结果预想得比实际情况更好。“人们大大低估了自己离婚、失业或罹患癌症的机率；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天赋异禀；都觉得自己能比同事作出更大的成绩；而且都高估了自己的寿命……” 神经系统科学专家塔里·沙勒特 (Tali Sharot) 在《乐观的偏差》(The Optimism Bias, 2012年) 一书中这样写道。

经济学家也具有这种乐观偏差——他们认为未来永远无异于过去和现在，甚至比过去和现在更好。这种乐观心态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增长预测方式，特别

是长期预测。

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呈现出长期、显著的经济增长。例如，2003—2013年中国人均实际（经通胀调整后）GDP平均增长了9.6%。非洲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尼日利亚发展形势良好，实现了平均5.8%的增长。这些增长是世界经济的福音，数百万人口因此脱离了贫困。但是这种良好的表现能持续多久？预测专家的预言往往都是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将持续下去，演变为中期和长期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像中国和尼日利亚这样的经济增长典范。但从历史上看，



一个国家在两个特定相邻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Easterly 等人，1993 年）；换句话说，过去的增长并不能准确地预示未来的长期增长状况。

经济增长的起伏

经济增长与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也受到自然消长规律的影响。19 世纪 80 年代末，英国统计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现父亲个子高的孩子往往身高都不及其父亲。他提出了“均值回归”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同理，经济显著增长后也会趋于衰退。尽管如此，正如经济学家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Lawrence Summers）所指出的，预测专家也有可能忽略“均值回归”（Pritchett 和 Summers，2014 年）。我们对多个国家 20 年间经济增长的专家预测结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了乐观偏差的普遍存在（Ho 和 Mauro，2014 年）。

预期之外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是造成一段时间内公共债务比率升高的主要原因。

虽然对中期（如五年期）和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预测常常被忽视，但其至关重要，其实它是对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投入。中长期预测很难得到准确的结果，时间跨度越大越难以预测。因此，依据错误预测结果作出的决策会给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各个方面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的净利润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比如，负责支出和税收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经济增长估计过高，那么在预测阶段的末期将会出现对政策债务与 GDP 比率估计不足的问题。因此，国家要么会出现超出预期的负债比率，其结果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要么就是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突然收紧财政政策——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事实上，预期之外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是造成一段时间内公共债务比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出现的债务危机、90 年代的重债穷国危机、2008—2009 年发达经济体中爆发的金融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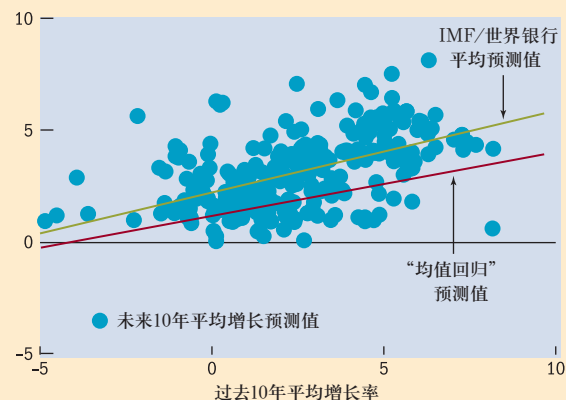
央行行长对中期或长期增长作出的错误假设会导致产出缺口——经济体在持续反通胀基础上的生产能力及其产品（经济萧条程度的衡量方法）——范围的估计值出错，进而导致适当货币政策决策的失误。举例说明，中长期增长的持续下降可能会被误认为产出暂时放缓，它可能会导致央行行长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

图1

过度乐观

与考虑到“均值回归”的预测结果相比，10年期增长预测结果往往较为乐观。

（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年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2006—2013年；联合国；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此样本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对约70个发展中国家2006—2013年间经济增长所作的预测，排除顶部和底部1个百分点数，以除去离群值。此增长预测结果已通过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转换为人均增长。绿线为贯穿此预测样本的最佳趋势线，即这条趋势线最能表现出分散观测的总体方向。红线表示均值回归预测值，它是从给定10年及下一个10年之间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中得出的。用于估计实证关系的系数取自142个国家1950—2010年间的较大规模样本。因此，红线代表与历史增长数据中观测到的统计模式相一致的预测结果。

政策，事后看来这种政策并不可取，可能会给通货膨胀率或财政稳定性造成影响。

以历史为起点

从原则上讲，依过往趋势所做的推测——即假设未来趋势与过往趋势完全相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如，制度质量、受教育程度、宏观经济政策的审慎性等）都会发生缓慢的改变（Easterly 等人，1993 年）。但事实上，记录显示这种推断的确得出了较差的预测结果。对 188 个国家 1950—2010 年的数据及每个国家每十年的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的分析显示，相邻十年的增长率之间的关联薄弱，依据收入水平和时间段不同，关联系数范围为 0—0.5（关联系数越接近 1，两个变量越向相同方向移动）。

即便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保持不变，经济增长也未能能在各时期持续发生，无论将这一时间段界定为 1 年、10 年还是 20 年。平均而言，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其过去增长率的几率达 30%，而这个国家有 70% 的几率使未来经济增长率恢复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增长实现“均值回归”的可能性很大。部分亚洲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出现了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经济学家的增长预测值是否反映了历史增长数据中所观测到的明显的“均值回归”？IMF和世界银行团队共同制作的70个发展中国家长期预测样本中，有证据显示该问题的回答是“反映不足”（见图1）。具体来说，IMF和世界银行的10年期平均预测值存在向上偏差，而且与考虑到回归历史增长均值的主要预测趋势相比，显示出了与过往增长之间的更大持续性。举例说明，过去10年中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的平均增长率与样本均值相等（2.4%），IMF和世界银行预测未来10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为3.1%，而依据“均值回归”体系预测的增长率仅为2.0%。换句话说，两者之间存在1.1个百分点的乐观偏差。从统计学角度看，这种乐观偏差较大，对于近期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其增长预测值的乐观偏差更加明显。长期（如20年）预测值的偏差更大。

预测生成的结果往往都将过多权重放在近期增长的表现上。

对经济增长过于乐观的预测趋向不仅仅存在于IMF和世界银行或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专家当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乐观倾向比发达经济体更加明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共识预测》（Consensus Forecasts）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预测结果也存在相似程度的偏差，这两个国家近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虽然经济学家们使用了广泛的预测方法，但各种预测生成的结果往往都将过多权重放在近期增长的表现上。举例说明，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结果由以每个单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全职工作团队提供，《共识预测》的平均预测结果由跟踪单个国家的既定预测专家得出，而OECD预测结果的得出以所有国家共用的一个复杂的、证据充分的模型为依据（因此不太可能受到预测者作出的主观决策的影响）。

潜在危害

乐观偏差对于经济增长预测结果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严重，即便偏差适度（如每年仅为1个百分点）也是如此。举例说明，一个处于当前政策条件下且增长率已给定的国家，在未来10—20年假设其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稳定保持在50%。如果经济增长每年低于预期值1个百分点——并且假设GDP下降1个百分点，这将导致赤字增长，增长率为GDP的0.3个百分点（此假设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不具特殊性）——那么，10年后债务与GDP的比率将上升到70%以上，并随

着财政赤字的扩大，20年后将这一比率超过120%。换句话说，此种程度的经济增长预测误差足以将一个处于稳定债务路径的国家变成一个面临财政危机风险的国家（为简单起见，假设并未收紧财政政策以响应GDP增长的下降）。

如果花费大量时间对实际增长结果进行观测，那么就不可能直接对过往预测结果的质量进行直接评估。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一项针对188个国家在1990—2007年间的增长预测结果的检查显示了经济学家们非常一致的乐观预测结果。具体来说，预测误差——预测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量——往往在各阶段均为正值（当年预测中值除外），正偏差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长（见图2）。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集体作出乐观的预测，预测显示经济增长表现优于依据历史经验得出的合理的结果？就某些方面而言，有人认为乐观主义是人性的共同特点，也许自然选择将这种特点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本性当中。归根到底，就像沙勒特所说的，人类每一天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乐观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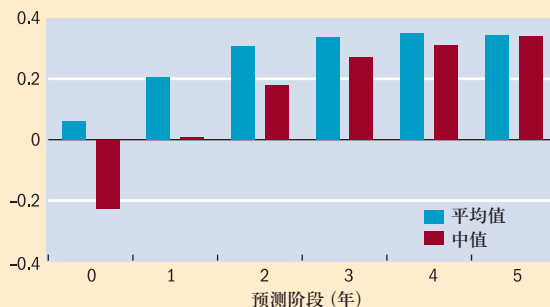
然而，除了人类的内在特征以外，还与经济专家得出并维护其预测结果的环境因素相关。中国和尼日利亚的经济在过去十年中增长强劲，如果此类国家的潜在关键增长因素——如制度和人力资本的质量几乎未发生改变，预测专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显著下降。相反，对于处于增长停滞期的国家——原因可能是经济或政治危机，甚至内战——预测专家不太可能或不愿意假设会发生类似的负面冲击或负面事件。增长预测还可能建立在过度乐观的政策假设之上——比如，政府将遵

图2

可预见的未来

经济增长预测结果是乐观的，长期增长的预测结果更加乐观。

（预测误差，实际GDP年增长百分点）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预测误差=预测值-实际值。实际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包括1990—2007年间188个国家的预测数据。

守他们的改革承诺，或者IMF和世界银行支持的计划将取得成功等假设——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乐观偏差的应对

如果预测的“失误”多于“命中”，那么对长期增长进行预测是否还有意义？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曾经说过：“预测虽然具有不可靠性，但远远胜过不预测。”

得出预测结果并对其作出解释的组织或个人——如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投资方——可能只考虑修正他们的乐观偏差，或者至少将更多权重放在其研究中的不那么乐观的其他情境上。要想推动对基线预测结果的深入研究，有一种方法是将重点放在“为什么这个国家持续无视‘均值回归’而增长速度却始终高于平均水平？”这样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普遍问题上，如“为什么所有条件都没变，但这个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增长放缓”。此外，负面冲击或低增长情境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这些情境已被纳入一些机构（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分析工作的常规内容。

概括地说，正如在一些跨国公司中常见的，将研究重点转移到“考察政策和企业战略在不同情境中的效果”才是明智之举，不要一味强调基线预测的结果。■

胡琪昂（Giang Ho）是IMF欧洲部经济学家，保罗·莫罗（Paolo Mauro）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客座教授。

参考文献：

Easterly, William, Michael Kremer, Lant Pritchett, and Lawrence H. Summers,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 No. 3, pp. 459-83.

Ho, Giang, and Paolo Mauro, 2014, “Growth: Now and Forever?” *IMF Working Paper 14/11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itchett, Lant, and Lawrence H. Summers, 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harot, Tali, 2012, *The Optimism Bias: A Tour of the Irrationally Positive Brain* (New York: Vintage).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Jan Svejnar, Andrés Velasco, and many others.

A 12-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The 2016-2017 program begins in late May of 2016.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6.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sipa.columbia.edu/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失灵的 国际货币体系

威廉·R. 怀特

全球经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在现行（非）国际货币体系下，这些不平衡无法得到解决

当今全球经济的特点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任何一种失衡都可能在未来引发经济危机。各种失衡是否皆因同一根源而起——国际货币体系的缺乏，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只是不再拥有为全球长远利益着想而约束主权国家短期行为的国际公认为准则，这是事实。

一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和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都存在这样的准则，但40年前这些准则就不复存在了。如今只有欧元区实行了这种准则。但全球层面的货币体系并不存在。经济大国可以在不顾对他国影响的情况下追求短期利益，尤其是通过较低的利率和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方法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行为使国内经济长期受到不可预测的后果的威胁，更严重的是，还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和其他方面的国内经济不平衡。此外，由于这类政策会导致各种国际经济失衡，所以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的长远最佳利益。

那么，全球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由谁来掌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负责监督该体系的IMF接管了对其成员国行为的监督工作，并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有条件的援助。但一直以来IMF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其对某些国家政策的

担忧，认为部分国家的政策不利于全球共同体的最佳利益。但是，对于很多大国来说，这些政策建议仅仅是建议而已。美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债务国，但由于持续使用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所以具有采取行动的自主自由。而就债权大国方面而言，IMF对其政策的影响一直非常有限。

全球经济不平衡

说到全球经济不平衡，经济学家可能会指出许多不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即一个国家的国际支出和收入间的差距。经常账户衡量商品和服务的净进口额和出口额、收入（如薪水和红利）和转移款项（如汇款和养老金）。从定义上看，经常账户的盈余和赤字相当于净资本流动。其风险在于，存在大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会让流动资本来源国丧失信心，最终导致汇率危机的发生。这类危机一般会给产出和就业带来危害。令人奇怪的是，尽管美国一再受到潜在危机的警告，但这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却始终未发生任何汇率危机。相反地，欧元区国家间经常账户不平衡的严重加剧却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粉碎了单一货币区不可能发



生这种危机的信念。

第二种全球经济不平衡与跨境资本流动总额有关，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认为跨境资本流动总额的优势在于游资——从一个国家的投资者流动到另一个国家投资者的以追求最高额回报为目的的资金，无论流入还是流出，游资都可能给小国造成巨大的破坏。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货币错配所带来的问题——资产主要为本国货币计价，而债务（如贷款）则以外国货币计价——这会破坏整个银行系统。借债方收入所得以本国货币计价，如本国货币贬值，那么以外币为主的贷款价格变得更加高昂，难以偿付。而且，这些流动资本的来源国也会相应受到严重的影响。简言之，如果债务国（以外币借贷的国家）无力支付，债权国就无法收回还款。

就债权大国方面而言，IMF对其政策的影响一直非常有限。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可能最终会促使各方从全球层面上对国内经济失衡进行观察，人们之前认为这种国内经济不平衡只会出现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经济体。这种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是如何从几个少数大国传播到其他国家的？主要发达市场经济体放宽货币政策用于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如瑞士）和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带来向上的压力。出于多种原因，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也通过放宽货币政策作出响应，因此助长了贷款和债务的累积。结果，20个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集团（二十国集团）的非金融债务水平与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210%增长到2014年年末的235%。并且大部分增长都出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2008—2009年间，这些经济体被视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现在他们似乎又变成全球经济问题的负担。

一个存在缺陷的非系统

当前（非）国际货币体系的各种不足基本上体现了上述不平衡的定义。除非我们能够弥补下文所述的所有不足之处，否则危机仍会重演。

首先，不存在自动的国际调整机制。原则上讲，在自由浮动的外汇市场中，外债账户和/或经常账户赤字庞大的国家，其货币应面临下行压力。越是

疲软的货币，出口价格越低廉，这就应该会促使生产转型，进而满足国外的需求。因此，应采取政策措施降低国内需求，使生产向满足出口需要的方向转型。盈余较大的国家会出现相反的压力。这些措施的顺序可进行有序调整，以便先行阻止盈余和赤字国家中不平衡的持续加剧，避免危机的发生。

但实际上，这些力量通常要经过相当长期的阶段才能发挥作用。那种认为依靠自由浮动汇率就能轻松解决经常账户不平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 汇率的变化对债务国和债权国的长期关系似乎毫无影响。在短期动量交易中，交易者买进或卖出货币以兑换其所预期的币种，这将会持续增加或减少货币的价值，受这种交易的驱动作用，汇率可能会持续多年偏离基数水平。

- 汇率的变化并不总是或者至少不会很快引起理想的生产能力的转型。例如，近期日元和英镑的贬值未能带来预期的出口量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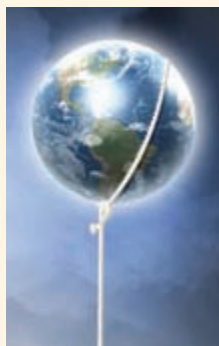
- 国内政策无需以任何方式反映一个国家的外部定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净债务国，但为应对更加疲软的总需求，美国采取了更多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对于这种情况，目前我们仍然无力阻止。与之类似，日本、中国和德国都是债权大国，但这些国家通过进一步扩大出口来应对更加疲软的总需求，目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近期所采取的降低欧元和日元价格的措施没有带来良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在中国引发同样的行为。

第二，发达经济大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破坏性。由于美国利率低，且存在众多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贷款，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率与美国利率的关联不断加强。因此，对其他国家消费的直接促进作用影响了当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资产的价格。部分学术观察家认为能够让这些国家恢复些许自治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资本管制——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施加不同类型和不同力度的限制。

再者，货币刺激似乎弱化了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这种情况导致了跨国银行的借贷增长速度大于资本的增长速度（即增长杠杆），推动了面向较小国家的借贷业务的发展。自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清算银行已经观测到资产管理企业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支配力日益增强，这些企业购买新兴市场中企业发行的债券。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尤其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均由离岸金融中心发行，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不断上涨，那么货币错配问题的幽灵会再次降临。而且，这些资本流入加之专为控制汇率而制定的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及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快速信贷扩张相关的其他不平衡。

有人认为从发达市场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

的溢出效应会非常明显，并且为受影响国家提出了多种自我保护方法。从本质上讲，这些建议可以归结为尽可能切断上文提到的溢出效应传导机制中的每一个环节：



那种认为依靠自由浮动汇率就能轻松解决经常账户不平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 利用监管工具减少跨国银行的杠杆使用，并通过监管工具控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流出。

- 进一步提高汇率。

- 利用资本管制调节资本流入。

- 通过采用宏观审慎的政策减轻此类资本流入造成的影响，即采用从整体上降低金融系统失灵风险的监管政策，而非采用监管对象为个体机构的传统政策。

近年来，IMF已经批准了多项此类建议——尤其是资本管制和更具活力的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虽然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存在不足之处，但它们有助于减轻溢出效应。例如，法规、资本管制和宏观审慎措施均存在很多漏洞；在自由市场中，这些方法可能会被规避，并陷入严重扭曲。这些方法可能会随时间逐渐失去效果。虽然由汇率承担主要调节责任看似合情合理，但动量交易能够长期拉大自由浮动利率与其基本平价间的差距，并且会出现相应的经济扭曲。简言之，能够轻松解决问题的灵方并不存在。

第三，从根本上讲，当前的“非系统”并不安全。全球泰勒原则（由经济学家约翰·泰勒提出，用于确定中央银行为响应通货膨胀压力应执行的利率变动水平）的建立表明，2002—2012年间的全球政策利率实际上低于规则中所描述的水平。其他方法显示，自1997年年初起，金融界实际毛利率（通货膨胀后）的全球标准低于长期自然利率（IMF所估计的，能够维持低通胀和经济体生产潜力的利率）的类似标准。而且，金融界实际毛利率和自然利率间的差额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明显拉大。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银行的措施使金融稳定性略有恢复，但同时这些措施也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将来发展如何仍然有待观察。

当前，几乎全球各地的货币政策都在持续积极扩张。这对于美国来说尤为重要，美国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残存部分的支柱。但是，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必须仅根据对美国经济的预期影响制定政策。这不仅对受溢出效应影响的国家不利，也会对美国造成伤害。目前，美国以外的国家在产出中所占份额要比20年前大得多，而其他地方的问题很容易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反作用于美国。

如今，全球各地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关于衡量全球流动性（即衡量全球信贷和资金总额）的新文献，而且其数量仍在不断增长。对于这种发展，我们当然是欢迎的，因为我们必须随时了解全球货币和信贷增长的总体情况。但是，目前不存在对于增长过度或增长不足的全球资产流动进行节制或推动的管制机制。有人提出了一个国际协调监控程序，用于评估国内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评估来判定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不合适宜。

第四，当前的国际流动性资源不足以应对危机的突然爆发。如果多个小国同时陷入困境，甚至只有一个大国出现危机，IMF为收支失衡国提供支持的可用资源完全不够用。在没有充足的公共部门融资的情况下，私营部门融资的撤回会造成内需的大幅下降，经常账户赤字会有效地消失。但因此带来的经济衰退将会异常艰难——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该国私人融资的丧失导致了经济的坍塌和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最近，跨国银行（多在主要欧洲核心国家）收回了其为一部分欧洲周边部分国家提供的贷款后，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事实进一步为这类问题提供了证据。

事实上，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初期，美联储开放了所谓的互换额度，准许在多个国家中使用美元。在美国资金来源（特别是货币市场互惠资金）基本枯竭的情况下，多家欧洲银行均遭遇了美元流动性的丧失。尽管如此，仍然有部分国家从中受益，但这些国家的选择标准并不透明，不是由国际社会共同体确定，而是由美联储确定。此外，当时的互换额度只是暂时限定，但2013年10月互换额度被规定为永久性的。

如果有国家认为在危机期间无法依靠IMF提供足够的流动资金——或希望规避与IMF支持的计划相关的条件——这些国家就会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这种情况不足为奇。遗憾的是，外汇储备的累积会压低升值中的货币的价值，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出现其他失衡问题，进而导致后续危机的爆发。这类危机似乎是当今许多大型新兴市场中的一个威胁。换一种说法就是，外汇储备的累积会提高国家处理危机的能力，但同时也加大的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此外，

各国还会愿意采取区域互助行动，如该地区其他中央银行的担保信用额度。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用，但这些区域性的协定还会损坏世界团结的意识。这些措施会导致贷款的限制条件明显减少，即造成经济监管政策的变动，比方说，与正常情况下IMF提供支援时所提出的条件相比而言。在充斥着道德风险的世界上制造更多的道德风险似乎不是最佳的全球性结果。

所需规则

我们当前使用的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体系，因为它不具备规则。它缺乏适用于经常账户失衡的国际自动调节机制。它还造成大规模溢出效应，包括从大国（尤其是美国）到小国的总资本流动，这种资本流动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在全球信贷和货币扩大方面，这一非体系具有不稳定性，非常危险，并且缺乏掌握足够资源的国际最后贷款人。

所有大国应就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达成自愿协议，这个体系要求每一个国家肩负起责任，在降低与全球经济失衡相关的危险中发挥重要作用。债务国将真正下定决心加速完成分内的任务。债权国也必须发挥作用，认识到危机也会给他们带来反作用。如果第一步比较困难，那么让所有的参与国认识到当前非系统的缺陷也是令人可喜的。但是，要调动主权国家的意志，促使这些国家为自身的长期利益合作制定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则是难上加难。■

威廉·R·怀特（William R. White）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和发展评审委员会主席。本文以威廉·R·怀特个人名义撰写。



实践中的税收制度

制定公平、高效的收入制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鲁德·迪·穆伊、迈克尔·基恩

税收政策往往受到简单的经验法则的指引。这些经验法则有时非常正确，但有时又具有危险的误导性。

比如，有句老话讲“税是旧的好。”就财产税来讲，这话挺有道理。但在窗户税和胡须税早已不复存在的当今时代，进口关税正逐渐下降，新型税收（如增值税）已经逐渐发展壮大。要制定健全的税收制度只靠动听的口号是行不通的。

我们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探讨过税收的基本原则（见“返归基础”，《金融与发展》2014年12月号）。现在，我们把这些基本原则应用到部分中央和现行税收政策的讨论当中。

个人收入

个人所得税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以个人支付能力为指标征税，高收入者所缴纳的税款越来越多。但是这个指标并不完善，因为政府不能确定工作者的高收入来自天赋才能或运气——二者不受税收的影响——还是来自勤奋的工作和创造力——这可能是事实。对收入征税不仅会影响工作（不仅包括工作时间，还包括创业活动和升职渴望等），还会导致避税和逃税行为。

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围绕着一项基本权衡进行：累进税有利于公平目标的实现，但会降低效率。只要人们对什么是公平持有不同观点，就永远也不会就最佳税率表普遍达成一致。但详细的理论与实证证据已经对关键考虑因素进行了阐述。

例如，不仅有必要考虑个人所得税，还有必要考虑所有税收和所有收入支持措施——比如美国的所得税抵免，为低工资工作者提供现金补贴，并随着工人工资的增长逐渐降低补贴。收入支持是一种负所得税，随着收入增加会逐渐撤回，这相当于对额外收入征税。

为低工资工作者提供收入补贴的确是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该群体的工作意愿特别容易受到税收的影响，保证他们工作期间的福祉成本相对较低。尽管底部的

平均税率将因此普遍变为负值，但有效边际税率——如收入增加1美元时需缴纳的额外税收（或未得利益）——应为正值。否则，补贴将扩展至所有纳税人，包括那些不需要补贴的纳税人。针对最贫困群体的收入支持限制了收入补贴的收入成本并可符合有效的再分配，即使它可能给最贫困的群体带来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

适用于高收入者的税率结构始终是一个争议性问题。许多人认为最佳方案是在不会导致工作热情降低或不会带来造成纳税额下降的大额避税和逃税的前提下，按60%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征税。如果提高收入是唯一的问题，那么情况尚可接受。然而，富裕的纳税人也会受到影响，这可能会对社会整体福利带来影响。此外，一些分析师认为依据最优边际税率得出的计算结果未能体现出此税率结构对创业的不利影响。

因此，从广义定性的角度看，最佳边际税率结构应呈U形——以高起点来补偿为最贫穷人口提供的支持，然后下降，以维持为中等收入工作者提供的激励机制，最后再升高以保障富裕人口的收入。这与边际税率应始终随收入而增长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却符合平均税率应随收入而增长这个基本概念。但这些成果还远远不够，关于U形边际税率结构仍然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

复杂的资本收入问题

资本收入——利息、股息、资本收益——在多数国家中主要归富裕人口所有。因此，对资本收入（或潜在的财富）征收高额税收通常被视为应对收入不公的好方法。但资本收入理论就这一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观点。

资本收入提供了未来消费的可能性。对资本收入征税提高了当前放弃消费的成本。倾向于推迟消费（或将资本转移至继承人）的较谨慎的部分人口会被征税，

及时消费的人口却不会被征税。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纳税横向均等原则（即所有相关方面相同的人群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理由是消费的时间优先并不是区分税务负债的合法依据。此外，储蓄不受鼓励之后，对资本收入征税可能会带来较大的无谓损失（因将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出去而产生的损失）。

为低工资工作者提供收入补贴的确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极端观点是，由于这造成了严重的行为扭曲，最佳资本收入税为零，且仅通过劳动收入累进税更好地实现收入再分配。另一派的相反观点则认为应向劳动和资本收入征收相同的税款——这是多年来最为普遍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不具备完全可靠的理论依据。然而，已经明确的是，对资本收入的理想税率即使不是零，也与劳动收入税率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由于资本更具国际流动性，这让在不扩大国外税基的情况下对其征税变得更加困难。现在许多国家采用了部分形式的所得税双重征税，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单独征收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

企业所得税的争议

赋税归宿的概念（即最终谁承担税收负担）是营业税的关键，其结论令人惊讶，大部分税收负担均由劳动者承担。以世界资本市场中的小规模经济体为例，且必须接受税后投资回报率的存在：如果投资者的收入低于此比率，他们会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如果一个国家向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征税，那么税前回报率将必须高到足以保持税后收益不变的水平。到时将需要资本流出。但是，这种流出会导致国内资本—劳动比率降低，进而降低劳动生产力，并随之降低工资。因此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真正承担者是劳动者，而不是股东。由于与间接征收企业所得税相比，向劳动者直接征税效率更高，这种经济体的最佳企业所得税是零。

企业所得税的重要意义。

首先，正常资本回报率（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回报率）应与超常回报区分开来，超常回报被称为“租金”。不同于正常回报，在不影响投资的情况下（例如，想像一下自然资源租金），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租金征税。然而，传统的企业所得税并不是租金税，因为企业所得税向所有股本回报、正常和超常回报征税。传统的企业所得税可以转变成租金税——比如，允许企业通过扣除正常的股本回报减少其应纳税收入。

一些国家已经就此采取行动。

其次，实际考虑因素愈发突出。例如，企业所得税能够有效地对企业保有的收入征税，但却很难对个人征税。同样，如果没有企业所得税，小型企业可以通过合并以及将收入标记为资本收入的方法逃税。此外，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对一些大型公司收税相对容易。

征收消费税？

统一的消费税率——对所有商品和服务采用相同税率——大致相当于对工资和利润收入征收的统一税率。由于其只在个人预算的另一层面操作，所以其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作用应该也是一个层面的。由于所得税更适合依据支付能力征税的原则，为什么政府要征收消费税呢？

征收消费税的实际理由包括：对收入和消费征税能够使政府的收入基础更加多样化，从而降低合规风险。但还存在更根本的理由，如对特定类型的消费进行征税可应对外部效应，即对于潜在交易中未涉及因素的或好或坏的效应，如污染。此类税收也可以解决其他问题行为，如酗酒、吸烟。另一个原因是，差异化税率可能有助于降低税收对工作的抑制。但从经验上看，事实证明，要确定以这种效率理由所保证的税率差异化的元素十分困难——也许也有例外，如儿童保健服务。

很多人认为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应采取非常低的税率，因为贫困人口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食品支出。但是这种追求公平的方式成本很高，原因是虽然贫困人口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必需品消费，但富裕人口的绝对消费额更大，他们才是从低税率中获益最多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应利用更合适的工具来实现公平目标——如为最贫困人中提供与收入相关的转移或其他形式的现金支持，或者公共住房补贴、医疗及基础教育。

业界已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即统一而全面的消费税是健全政策的合理基准——税率差异化方面几乎不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外部效应除外）。这是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提出了令人满意且可行的建议——但它依赖于相当详细的实证和理论推理。政策制定者必须警惕诸多没有实证依据的税收建议。■

鲁德·迪·穆伊（Ruud De Mooij）是IMF财政事务部副部长，迈克尔·基恩（Michael Keen）是该部门副主任。

谨慎者的诅咒

如若没有适当的公共机构，强权政治的诱惑会危及长期发展目标实现

维托尔·加斯帕尔

1596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第四次宣布无力偿还债务。作为执政者，腓力二世经多识广、步步为营，任何微小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要求自己亲信的顾问为他出谋划策，反复深思熟虑，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困难的政治决策进行探究。他将政府工作的行政记录整理完备。甚至命令建筑师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重新设计了一座城堡作为首座政府档案馆，执行严格的档案法规，此档案馆一直作为官方文件档案库，直至19世纪。他在处理政治事务时机智而审慎的态度以及他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多项创新举措为他赢得了“谨慎者腓力二世”的名号。

腓力二世虽然具备卓越的执政才能，但在他当政初期，就分别于1557年和1560年两次被迫宣布破产，原因有二。其一，腓力二世继承了属于他父亲查尔斯五世的私人债务——在当时，私人债务和国家债务之间的区别尚无明确界定——可以偿付债务的财力有限。其二，这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经过与法国亨利二世的战争后，西班牙国库已经枯竭。

1574年，腓力二世第三次宣布破产，他曾将这一决策推迟了一年。这一次破产会影响他本人与热那亚银行家签署的债务合约，损害他的个人声誉。1575年，他最终同意签署一项法令，暂停对短期贷款(asientos)进行债务清偿，这种短期贷款是一种在通常情况下使用美洲白银偿付债务的短期高成本官方债务工具。

这项政令解释了国王的失望，因为愿意贷款给政府的债权人太少，利率的水平之高也让他感到震惊，并且一般说来使用信贷在道德和法律层面都是不可靠的活动。因此，在对所有条款、条件和过往偿还记录进行彻底审查之前，西班牙不会支付任何还款。这些都是当时暂停债务偿付的理由。

对于1596年宣布的第四次国家破产，没有任何记载显示腓力二世曾表现出犹疑不定，1596年政令的签署也非常迅速。



维托尔·加斯帕尔(Vitor Gaspar)是IMF财政事务部主任。

为何谨慎者腓力二世要采用昂贵的短期贷款进行借贷，让国家无力偿还而宣布破产呢？其原因具有政治性。这种做法能够维持国王对其资源的独裁控制。他不必向立法机构作出让步，因为签署由经常性财政收入支持的长期债务需要得到立法机构的批准。他有不妥协的筹码，因为正如他父亲查尔斯五世在位时一样，美洲白银的及时到位时反而会拯救财政的廉洁。这些事实的确延误了16世纪西班牙在政策、制度和金融领域的发展。

腓力二世的例子并不罕见。它呈现了政治、制度制定和公共政策的本质——治理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税收、支出和融资方面的全部政策决策中。

腓力二世的故事与当代许多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丰富却陷入“资源诅咒”的国家的经历相同，“资源诅咒”通常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财政发展薄弱和政治瓦解。

直观地说，自然资源似乎是上帝对一个国家的恩赐。资源财富应该使为可持续增长投资的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让政府有能力提供教育、卫生和个人

意外集体保险等基本社会服务产品。然而，仍有众多资源富裕国家未能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相反，在最近几十年中许多高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都不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

主要问题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会扭曲政治和经济的刺激机制。如果放任不管，自然资源财富会将政治工作从政府的核心职能转向自然财富的占有。换句话说，自利行为的诱因有可能会主导政治活动。由于政府会偏向为个人提供高回报的活动，支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物理和实际结构便被忽略。在极端情况下，自然资源财富的竞争甚至会导致内乱。此外，个人通过政治游说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机会可能会导致创业型人才偏离生产性活动。

总之，自然资源收入的管理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考验。制度薄弱会导致自然资源错配和管理不善，给社会和平、效率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带来危害。繁荣—萧条周期是指自然资源收入高的“繁荣时期”的低效公共支出的增加，以及紧随其后的资源收入萎缩的“萧条时期”支出的急剧下降，这种周期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过分依赖商品和出口创汇收入，并且容易受到不可预知的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商品价格的显著下降。例如，金属价格已从2011年的峰值急剧下降。2014年下半年石油价格突然下跌，这种下跌趋势一直持续到2015年年初。截至2015年1月，大多数石油出口国的石油价格远远低于其名义上的财政收支水平，即国家平衡预算所需要的平均油价。商品价格最近大幅变化的这种不可预测性，突出了公共财政管理对于自然资源大国的重要性。

另一项挑战来自所谓的“荷兰病”。实际汇率的增长以及用于支付非可交易商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收入将资源从竞争性可交易商品部门转移出去，削弱了开放性，降低了经济增长。

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政府机遇的增加也带来了许多责任。这些国家短期内的任务是将政府支出与不稳定的资源收入分离开来，打破繁荣—萧条周期的限制。

事实证明，财政制度是有助于实现这种分离的强大工具。

智利一直奉行审慎的财政管理政策，该国采用了一项旨在实现结构性预算平衡的财政规范对其铜矿收入进行管理。长期铜价与潜在GDP的数值由独立的专家小组设定，增强了这项规范的透明度。

在挪威，公共支出的融资渠道只有一种，即过往资源开采积累的资产所产生的收入。此外，挪威已授权独立的中央银行而非财政部负责其石油财富的管理，这种做法的目的很明确——拉开石油基金的管理和政

治程序间的距离。

博茨瓦纳因其妥善的政府治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健矿产资源管理系统赢得了良好声誉。博茨瓦纳对矿产资源实行规范化管理，确保当前支出仅使用非资源收入资金。资源收入可能用于支持投资或存入普拉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便将财富移交给子孙后代。

即便是以谨慎著称的腓力二世也会受到强权政治的诱惑，而忽视财政制度的建设。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妥善管理自然资源财富的范例。

各国政府还面临着建立公共制度的重任，用以防范有利于个人长期发展收益的行为。财政透明度和妥善的治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IMF积极推动的一个主题。

为了确保更加有效的权力制衡和更大的透明度，自然资源收入管理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 全面的法律框架和财政制度，提供公开、透明的自然资源开采权授权程序，对资源收入产生与税收的治理作出明确规定；

- 政府和资源公司提供的关于掌握自然资源使用权、开采和贸易活动以及资源收入支付和税收的全面、及时和可靠的报告；

- 预算文件，此文件应明确阐述政府的资源管理目标并报告资源收入在公共支出和储蓄中的分配；

- 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社会、环境和经营风险的披露、分析和管理的。

在理想情况下，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将与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共同发挥作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稳定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为建设鼓励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显然不够。没有适当的激励结构作保障，政治利益可能会凌驾于长期发展目标之上。

请记住，即便是以谨慎著称的腓力二世也会受到强权政治的诱惑，而忽视财政制度的建设。妥善的治理和强有力的制度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适度期待与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波动相关的难题会引导各国施行稳健的公共财政管理实践，促进长期繁荣与稳定。■

减少非正规性

拉维·坎布尔、迈克尔·基恩

作为一句口号，它可能很响亮，但作为税收改革的实际目标，它却毫无价值

在发展中国家的众多税收问题当中，非正规经济几乎总是高居榜首或名列前茅。“向非正规经济征税”已成为非洲发展银行的重点税收工作(Mubiru, 2010年)。奥瑞尔和沃尔特斯(Auriol和Warlters, 2005年)认为“难以征税的大型非正规部门”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问题。而发达经济体方面也面临着同样问题。IMF(2013年)表示造成“希腊收入效率低下”的部分原因是该国“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

由此可见，减少非正规性时常被视为税制改革的中心目标。但是正如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所述，非正规性的精确定义是以劳动制度和企业规定为基础的，并非以税收考虑为基础。因此，减少非正规性

的相关观点可能不是制定税收政策的有效指导原则。

纳税还是不纳税

在税收讨论中，非正规性的意义几乎没有得到明确阐述，经济学家建立模型后，非正规性通常指到期应缴税款总额没有汇付，即没有按时付税款。但是，企业或个人不纳税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只是(规模或收入)低于履行法定纳税义务的起征点——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他们为低于税收起征点而减少活动。或者他们可能逃税——欺骗性未纳税。为什么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企业或个人不纳税相当于他们未支付



任何费用，甚至更加严重？问题在于当税收制度的制定不仅影响缴纳金额，还会对多种不纳税的方式产生影响时，税收系统的结构是怎样的。

此外，个人和企业通常都负有不同的义务，他们可以选择遵从或不遵从这些义务，这些义务不仅涉及不同税收（如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也涉及其活动的不同方面，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比如，他们有可能面对各种劳动法规和税收规则。这就带来了一系列几乎被完全忽略的政策挑战。影响一种义务遵从性的措施如何对其他义务遵从性产生影响？是否有必要将限定不同义务的标准协调起来，以便让其全部实施或全部不适用？

个人和企业通常都负有不同的义务，他们可以选择遵从或不遵从这些义务。

要了解为何这些至关重要，并说明不同类型的机构能以怎样不同的方式应对税收设计的改变，就要看一看所有税收系统共有的一个关键元素：法定到期应缴税款的起征点。大部分税收——以及大部分法规——都包括这个临界值，因为对政府和纳税人来说，如果这些税收和法规仅适用于最少一部分人，成本就过于高昂了。

比如，想像一下一个简单的税收设置，在这个设置中，唯一的税收或法规就是增值税（向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所增加的价值征税，对最终购买者来说就是营业税）。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存在一定的营业额起征点，超过这一水平，企业将为其所有营业收入缴纳固定税率的税金。此外，企业在缴纳与营业额水平无关的税收时，还面临着一定的合规成本。（这意味着：没有企业会申报刚好超过此起征点的金额，因为将产出降低至刚好低于起征点的水平所节省的固定成本大于因此产生的营业额损失。有迹象表明，这种影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Onji, 2009年）。再假设企业能够实现的最大营业额各不相同，尽管他们可以选择降低营业额。他们还可以选择缴纳少于按其真实营业额计算的到期应缴税款的税款，但是他们要为这种欺骗行为付出代价——如果被发现，他们就要接受惩罚。在这种设置中，企业将被划分为五类，按税前营业额从最小型到最大型企业排列（Kanbur 和 Keen, 2014年）：

- 最小型企业，如最大营业额低于税收起征点的微型企业：他们申报真实的收入，不纳税；
- 调节型企业，规模稍大于最小型企业，最大营业额高于起征点，但通过合法手段让运营收入刚好低于税收起征点，以避免纳税和支付合规成本；
- 幽灵企业，真实营业额高于税收起征点，但选择虚

报低于税改起征点的金额，或者干脆不申报；

- 舞弊企业，营业额高于起征点，但仅申报部分营业额，并未申报全部营业额；
- 大型企业，申报真实营业额，缴纳全额税款。

当然，这种分类过于简单——但并非不切实际。它清楚反映了按规模对纳税人进行的细分，以及对在税务部门中日益普遍的合规风险进行的细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细分以税收制度的设计为依据，并将对其作出响应。

税收政策与非正规性

如果非正规性意味着税收（或部分到期应缴税款）的不汇付，那么除大型实体企业外的其他企业均为非正规企业。但是，这些非正规企业的类型各不相同，若将他们归为一类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

要理解这一点，应先考虑增值税起征点的微小增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增长对大型企业的决策没有影响，因为起征点远远低于其营业额，因此将营业额降低到起征点以下对这些企业来说显然是不值得的。因此，大型企业的数量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类别企业的总数量也不会发生变化。换言之，非正规企业的数量不会改变。

然而，起征点的提高真正改变的是非正规经济的构成。起征点的提高意味着诚实地将产出拉低至刚好可以规避纳税的水平这个做法将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产出损失会更小。一些幽灵企业将因此转化为调整型企业。同时产出将出现增长，原因是曾经在起征点徘徊的企业现在可以将营业额再提高一点。但增值税起征点的增长对于舞弊企业并无影响，因为调整并不是与他们有关的替代方案。而且由于只有舞弊企业和大型企业支付税金，所以税收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提升增值税的起征点是一种不影响非正规企业数量或税收收入的税收改革，但仍然是可取的，因为对完全遵从税法缴纳税款的企业而言，这促进了其产出的增长。相较于简单的“减少非正规性”的口号，这一结果的含义更为丰富。

这一事实表明，提高起征点直到所有的幽灵企业消失这个做法将是一项有益的政策（Kanbur 和 Keen, 2014年）。对这一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避税和逃税可能性的存在说明了最优税收起征点高于其他情况下的起征点。这一结论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再次与认为税率的设定越低越好以便扩大税基的常规观念相悖。为了将更多的非正规企业纳入税收系统而设置较低的税收起征点是一项完全错误的政策。

企业几乎总是面临着不同的显性或隐性税收制度，这一重要的事实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视。以印度为例，为处于某些具体就业起征点的制造业企业而颁布的《工厂

法》(Factories Act)带来了注册与工作者福利要求,同时中央消费税仅在超过指定营业额水平时才需要支付。在这些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必须扩大用于分析增加增值税起征点的样本框架。

试想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企业需要履行两项起征点不同的独立纳税义务,如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因此,将出现两种可能。如果两个起征点非常接近,我们会预计,通过调整营业额避免一种税收的企业同时也能依据另一起征点对营业额作出调整(因为这涉及到固定成本,仅略高于一个起征点的营业额并不合理)。另一方面,如果起征点之间差距较大,则完全可以仅针对起征点较高的税收作出调整。

无统一的概念

传统上将非正规性定义为税收未汇款,这种定义很容易应用于第一种情况,因为企业要么两种义务都遵从,要么都不遵从。但如果两个起征点差距较大,可能性就较为复杂:一些企业可能会缴纳两项税款,一些企业可能会缴纳其中一项,调整营业额避免另一项税收,还有一些企业可能调整营业额避免一项税收,其营业额可能低于另一项税收的起征点。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完全不可能说明非正规性的构成。在税收或其他义务超过两项的情况下,评估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换言之,非正规性并不具备统一的概念。这意味着,非正规性不能构成税收政策的基础,必须采用与社会目标和企业对税收手段的响应直接相关的思想体系。

还有一个几乎被完全忽略的相关政策问题:在包含多项义务的制度设计中,政策制定者应该确定一个常规起征点,还是多个完全不同的起征点。我们觉得很多人的回答都会是:将一个常规起征点用于多项义务的做法可能会让企业的日子更好过一点。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只是一部分事实。其他考虑因素会将政策制定者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例如,假设对与印度《工厂法》注册要求相类似的规定进行校准,使其起征点与增值税起征点要求的营业额处于同一水平。那么,一些公司会调整营业额以避免履行这两项义务。如果《工厂法》规定的起征点升高,处于起征点以下的企业将会雇佣更多工作者,创造更多营业收入。最终,这些企业会达到一个阶段,到时他们会选择将营业额提高到增值税起征点以上,但仍低于《工厂法》规定的起征点。提高某一项义务的起征点将会引导企业履行另一项义务。只要另

一项义务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是积极的,事实表明以这种方式区别对待不同的起征点可实现整体福利的增长。

短期内,与税收相关的问题还将用到“非正规性”这个术语。但重要的是,我们应明确这一术语在税收政策环境下的调用具有不精确的风险。税收政策的宗旨(公平问题除外)应该是提高社会福利,并将普遍存在的效率与平等问题纳入考量减少非正规性的口号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和某些中期目标一样——实际上不但不能起到理清思路的作用,反而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拉维·坎布尔(Ravi Kanbur)是康奈尔大学世界事务T.H. Lee教授,迈克尔·基恩(Michael Keen)是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Auriol, Emmanuelle, and Michael Warlters, 2005, “Taxation B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9, No. 4, pp. 625–4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3, *Measuring Informality: A Statistical Manu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Genev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3, “Greece: Ex Post Evaluation of Exceptional Access under the 2010 Stand-By Arrangement,” *IMF Country Report 13/156* (Washington).

Kanbur, Ravi, and Michael Keen, 2014, “Thresholds, Informality and Partitions of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Vol. 21, No. 4, pp. 536–59.

Mubiru, Alex, 2010, “Committee of Ten Policy Brief—Domestic Resource Mobilization across Africa: Trend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Tunis: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Onji, Kazuki, 2009, “The Response of Firms to Eligibility Thresholds: Evidence from the Japanese Value-Added Tax,”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3, Nos. 5–6, pp. 766–75.



沉闷的科学?

IMF

在播客上聆听我们对顶级经济学专家的采访并作出决定:
www.imf.org/podcasts

如何为拉丁美洲 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IMF—世界银行年会将于2015年在秘鲁举行，此前IMF在拉丁美洲大学生之间举行了一次征文竞赛，要求参赛者撰写一篇关于“如何为拉丁美洲打造更美好未来”的短文，并在文中讲述年轻人认为该地区未来一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同时提供解决方案。8名入围者受邀参加IMF 2014年年会。在智利贡塞匈大学求学的29岁哥伦比亚人阿德里安娜·劳瑞娜·罗哈斯·卡斯特罗（Adriana Lorena Rojas Castro）最终赢得了此次比赛。以下是她写的短文。

拉丁美洲及其面临的挑战

阿德里安娜·劳瑞娜·罗哈斯·卡斯特罗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也是存在诸多特质的地区，这些特质让其较其他大陆更具吸引力。尽管我们拥有巨大的文化和环境财富，但在生活水平方面却远不是其他地区羡慕的对象。

贫穷、不平等、暴力、环境恶化和贩毒等问题是我们这一地区的标签，阻碍着我们的发展。但这些问题需要大家携手解决，而不是我们继续孤军奋战。我并不认为我们做的不够好，只是认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地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不平等。我认为我们需要改善针对初学者的教育质量，而非根据许多学生的要求提供免费教育。我们需要改善所有层面的教学条件，在高等教育方面必须变得主动并为学生配备更好的工具。

通过改善教育环境，我们可以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我们可以增强创新力来实现更好的本地发展，进而减少不平等并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一个需要社会各行各业参与的流程，会帮助该地区巩固其在全球化世界的地位。

拉丁美洲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暴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应对。一方面，每个国家面临着与贫穷和不平等相关的问题。我之前曾提到，改善教育质量是第一步，但是我们也需要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而非提供补贴，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工作工具。

最后一个挑战也同样严重，那就是环境恶化。其解决之道不是禁止自然资源开采，而是加强大公司的环保意识

并提供激励举措，使生产活动能以更环保的方式展开。

以上就是我对拉丁美洲的担心，而对于我自己的未来，我的担心是我无法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积极发出声音，来帮助我的祖国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我还担心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所获得的工具不足以应对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

我这一代人和我本人都需要完善自己以积极参与私有或公共部门，而且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政策以及生产和提供服务来实现创新这样我们就能为这两个部门带来变革，而这些变革则会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有所促进。■

入围者：

丹妮拉·阿莫特吉·马丁内斯 (Daniela Amórtegui Martínez), 19岁,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罗萨里奥大学

路易斯·吉列尔梅·德·布里托·苏亚雷斯 (Luiz Guilherme de Brito Soares), 24岁, 巴西, 巴西伯南布哥天主教大学

贡萨洛·尔塔斯 (Gonzalo Huertas), 26岁, 阿根廷,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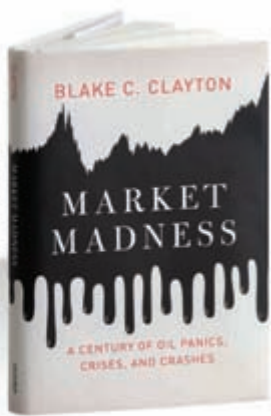
纳比勒·洛佩兹·哈瓦 (Nabil Lopez Hawa), 24岁, 多米尼加, 美国密歇根大学

马里亚纳·蒙特罗·维加 (Mariana Montero Vega), 19岁,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大学

毛里西奥·拉达·奥雷利亚纳 (Mauricio Rada Orellana), 19岁, 秘鲁, 秘鲁太平洋大学

莫妮卡·索德列·皮雷斯 (Monica Sodré Pires), 29岁, 巴西, 巴西圣保罗大学

动荡不安



布莱克·C. 克莱顿

《疯狂的市场》

百年石油恐慌、危机和崩溃

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15年，248页，27.95美元（精装）。

自从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后，人们就一直担心有限的自然资源可用性可能会约束经济增长和人类福利。对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马尔萨斯的担忧主要是资源枯竭。

截至目前，这些担心尚未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实质性证据表明，大宗商品实际价格处于下降趋势，虽然不可再生大宗商品生产呈指数增长。尽管如此，当价格增长超过趋势时，对资源短缺的担心——包括原油在内——也经常浮出水面。

我们可能会见证对石油枯竭普遍担忧的另一阶段的终结。21世纪初，当油价到达历史新高时，关于全球石油产量将到达顶峰的预测引起了广泛关注，但随后发生的北美页岩革命以及2014年年底的油价腰斩削弱了公众对此类预测的关注。

在《疯狂的市场》(Market Madness)中，布莱克·克莱顿(Blake Clayton，现任花旗银行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能源研究员)以“非理性焦虑”的视角分析了越来越担心石油枯竭的四个阶段，“非理性焦虑”暗指《非理性繁荣》，这是罗伯特·希勒关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著作。克莱顿的假设是非理性繁荣背后的一些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也适用于非理性焦虑。

克莱顿重点关注希勒的一个论点——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市场扩张常常伴随着一个普遍观点，即认为未来比过去更加光明或者不确定性更少。在石油市场，基于对石油储量是有限的和价格会因为供不应求一直上涨论点的变形，价格稳步上升引发了对短缺的担忧。

克莱顿研究的四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从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初，但是也有共同的元素。例如，在第一个阶段，即1909—1927年，随着内燃机在运输业占据主导地位以及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石油需求迅速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石油需求增长。1909年，美国地质调查局进行的美国原油总储量研究得出结论说石油储量将在1935年耗尽。这项研究承认可能会发现新油田，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这不是最后一次严重低估已发现油田的经济变量以及新发现油田和技术进步的范围。

在第一个阶段，预测的市场结构变化并没有发生。例如，峰值石油理论家认为人类已经使用了大约一半的地下石油资源，产量下降不可避免。但是，石油资源基础可能继续增加。第二个阶段介绍了实际结构转型导致价格不断上升的

预测。在第三个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时代，人们广泛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市场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油价会持续上涨。但是，随着其他生产商的进入以及需求变化，市场力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由于石油可以存储，所以它是一种实际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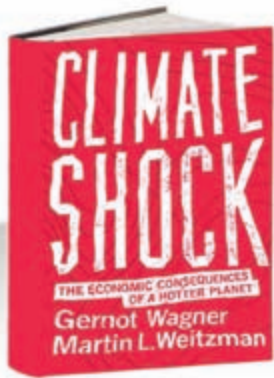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克莱顿并没有一直追随希勒的脚步。他没有考虑非理性焦虑和价格上涨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也没有考虑石油价格泡沫的可能性。考虑到现行定价机制和政府干预（如战争期间），在前两个阶段忽视这个关联可能不会有问题。相反，克莱顿认为一直有石油焦虑的人有时会有政治动机，企图影响政府政策来影响石油市场。但在最后一个阶段，即1998—2013年，石油价格构成发生在现货市场，石油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由于石油可以存储，所以它是一种实际资产，应该对这些阶段非理性焦虑和价格构成之间的关联进行更多讨论。

前两个阶段主要是针对美国，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市场还没有国际一体化。不过，对石油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会发现，考虑这些阶段非常有趣——尤其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研究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

托马斯·赫尔布灵
(Thomas Helbling)

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

六摄氏度带来的灾难



赫尔诺特·瓦格纳、马丁·威兹曼

《气候冲击》

全球变暖的经济后果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年，264页，27.95美元（精装）。

这本书信息量大，有说服力，也很容易理解，为普通受众提供了一个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案例。

《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指出，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最紧迫的原因是可能引发灾难性结果；最重要的是，除非在本世纪采取措施，否则温度上升6摄氏度的风险将达10%。这本书认为，碳定价应该成为减缓措施的重心，但是也警告期间存在着若干挑战，尤其是投机取巧行为（鉴于所有国家都要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所以个别国家企图避免采取减缓措施）。没有采取减缓措施的个别国家可能求助于成本不高的地质工程——例如，释放硫粒子进入大气层来反射阳光——这会引发巨大的风险，包括改变全球降水模式，同时也无法解决海洋酸化给海洋食物链带来的威胁。

碳定价案例——针对燃料燃

烧收取二氧化碳(CO₂)排放费——已经十分完善：排放价格反映在高碳燃料、电力以及其他能源的价格上，这提供了大量减排机会。这些机会包括从使用煤炭转向使用天然气或可再生燃料以及减少对电力、运输和加热燃料的需求。但是，除非碳定价收入得以高效利用——用于财务整顿，扩大职工收入以及资本积累等更广泛的减税范围等——否则，碳定价会加重经济体的成本。

作者没有讨论碳税与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碳排放交易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可以交易的固定限额限制污染权），尽管在我看来后者更为复杂（也许暗示了关键设计缺陷风险更大）。碳排放价格稳定——对于每年的成本效益很有必要以及为了促进清洁技术投资激励——在收取碳税情况下是必然发生的，但是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下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如价格下限和上限。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下，如果碳定价是更广泛财政改革的一部分，限额必须拍卖，拍卖收入必须上交财政部。

作者认为，因为极端气候风险和长期贴现建模方面有很多问题，当前一些对反映未来气候变化损害的排放价格估计太低——每吨二氧化碳约40美元。但是，这个担忧现在看来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目前只有约12%的全球排放有定价，一般为每吨10美元左右，或者低于10美元。

投机取巧问题已经在关于执行各国减排承诺的国际气候谈判和对贫穷国家减排提供适当补偿方面引起了不愉快。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点被夸大：碳定价实际上可能对国家有利，如果国内环境受益超过减排成本——例如，

因为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当地空气污染问题致死率下降。IMF认为，在计算全球变暖好处之前，从排放大国的平均值来看，获得这些好处需要保证二氧化碳价格约为每吨57美元。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使我对碳定价前景比作者更为乐观。新收入对寻求降低其他税收、满足财政危机浪潮中的整合需求、或是为大型非正式部门限制扩大税基的国家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的财政部很有吸引力。碳定价可能会对大多数财政部正在实施的规定进行简单的扩展：它可以在现有汽车燃料税中增加碳税，将类似税收应用于其他石油产品、煤炭和天然气的供应上。需要在国家层面对碳定价在环境、财政、卫生和其他方面的好处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帮助政府向立法者和公众传达碳定价案例。

这本书本也可以阐述一下碳定价的相关辅助措施。例如，需要设计的各种工具（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以便减轻对脆弱家庭和公司的影响。清洁技术激励也有一定作用，但是在使用哪些工具和如何设置工具水平以及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如何淘汰这些工具方面需要提供指导。在国际层面上，监控和实施与联合国进程互补的协议的实用性（例如，关于排放大国的碳税税率下限）必须具体化。

虽然这本书奠定了基本知识基础，但是在仔细考虑推进碳定价的实用性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伊恩·帕里
(Ian Par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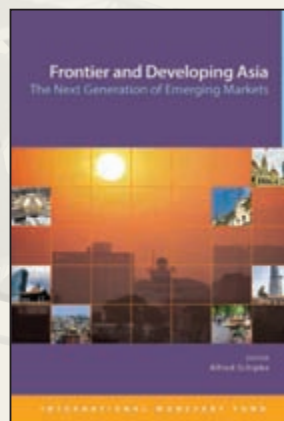
IMF财政事务部
主要环境财政政策专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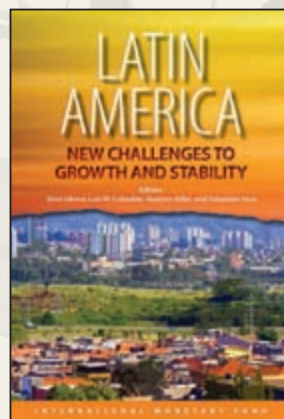
《前沿和发展中亚洲： 下一代新兴市场》

Alfred Schipke 编
25美元，约280页，平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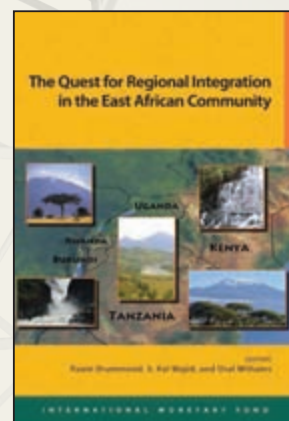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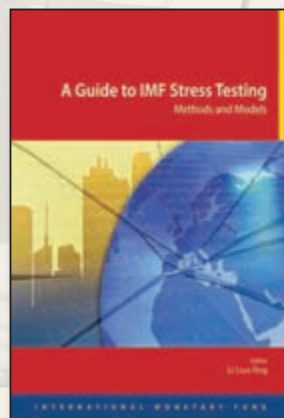
《拉丁美洲： 在全球大变革的环境下 维持增长和稳定》

Dora Iakova, Luis M. Cubeddu, Gustavo Adler和
Sebastian Sosa 著
25美元，270页，平装



《IMF压力测试指南： 方法及模型》

Li Lian Ong 编
65美元，609页，精装



《安倍经济学能成功吗？ 克服日本失去的20年的影响》

Dennis Botman, Stephan Danninger和
Jerald Schiff 著
25美元，约200页，平装

《对东非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探索》

Paulo Drummond, S. Kal Wajid和
Oral Williams 编
35美元，308页，平装

imfbookstore.org/fd35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2015



MFICA2015001